



西晉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M37 東壁



曹魏 鮑捐神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 石龕 墓主圖像



北魏和平二年（461）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M9壁畫墓 北壁 墓主圖像

魏晉至北魏平城時期墓葬文化的變遷： 圖像的觀點

林聖智*

【摘要】本文嘗試由圖像運用的角度來重新檢視魏晉至北魏平城時期墓葬文化的變遷過程。魏晉時期盛行薄葬，促使設奠、神座、靈牀成為墓葬中的重要陳設，表現出靈魂僅暫時憑依於墓室，而非永久居住於墓室的生死觀。這類陳設並反過來影響墓室壁畫的布局，促使墓奠與壁畫之間出現互動關係，祭器、帷帳、正面墓主像結合成一完整的祭祀單元。北魏建國之後代人集團趨向採厚葬，恢復寢廟並建立墓碑，重新在墓葬中有系統地運用圖像，強化墓室作為地下居室的象徵性，然與此同時，魏晉薄葬的陳設卻也以新的面貌保留下來，逐漸發展出綜合了漢晉制度與鮮卑故俗的新型墓葬文化，本文稱之為「平城型厚葬」。為求深化墓葬圖像研究本文提出「圖像觀」的議題，嘗試兼顧鮮卑故俗、漢晉文化、佛教信仰等多重因素來探究代人集團觀看／運用墓葬圖像的方式。

關鍵詞：魏晉、北魏、薄葬、厚葬、墓中設奠、圖像

前言

藉由墓葬文化的整體發展來考察墓葬圖像，有助於將墓葬圖像的研究與歷史文化的脈動相連結，並為圖像解釋提供必要的參照架構。基於此一認識，本文嘗試由圖像運用的角度來重新檢視魏晉至北魏平城時期墓葬文化的變遷過程。為了勾勒出問題的全貌，本文同時也會討論到隨葬品、葬俗、葬制、生死觀等各方面，然論述的主旨仍著重考察墓葬圖像的地位在這段期間的轉變。

關於魏晉時期墓葬文化的研究，1980年俞偉超將此階段發展定義為由「漢制」到「晉制」的轉變。^①此文的重點在於討論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形制的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研究員

① 俞偉超，〈漢代諸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32-337。

發展，對於晉制的具體內容以及生死觀的變化等問題並未著墨。^② 不過藉由這樣的定義將魏晉時期墓葬文化的重要性提升到與周制、漢制同等的地位，喚起了學界的問題意識。自上一世紀八〇年代起隨著考古材料的累積，學者考察了薄葬論的興起、墓葬形制與隨葬品種類的變化等問題。^③

由於魏晉時期壁畫墓主要分布於河西、遼東地區，在中原一帶幾已消失，相關研究中遂出現壁畫墓與葬俗研究相互疏離的弊病。研究壁畫墓者由區域角度觀察區域性如何形成，考察晉制者則關注中原墓葬形制等變遷，卻將圖像問題排除在外。然而魏晉時期墓葬圖像與葬俗之間應當有所關聯，其中尤以壁畫與墓內設奠的關係最值得注意。所謂墓內設奠意指喪家在下葬後到尚未封門之前，於墓室內所施行的祭奠。^④ 雖然已見於漢墓葬俗，但是進入魏晉時期隨著薄葬的興起，墓內設奠替代了部分的地上祭祀活動，具有新的重要性。^⑤ 以往關於漢晉墓內設奠的研究主要就隨葬器物的種類、陳設方式來陳述，並未觸及圖像問題。本文嘗試探討墓內設奠與墓葬圖像配置之間的相關性，墓主圖像的呈現方式為關注的焦點。

② 早期關於魏晉喪葬文化變遷的考察有上村幸次，〈三國時代喪葬禮俗私考〉，《大谷學報》，17卷2號（1936），頁137-148。

③ 魏鳴，〈魏晉薄葬考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學社會科學）》，1986年4期，頁133-143。楊泓，〈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文物》，1999年10期，頁60-68。收入氏著，《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1-7。韓國河，《秦漢魏晉喪葬制度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50-118。李梅田，〈曹魏薄葬考〉，《中原文物》，2010年4期，頁17-69，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190-196。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考古學報》，2015年3期，頁345-366。

④ 楊泓，〈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頁60-68。

⑤ 關於漢代墓內設奠的葬俗，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241；李如森，《漢代喪葬制度》（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頁62-63。漢墓祭祀空間的發展參見黃曉芬，〈漢墓の變容—槨から室へ—〉，《史林》，77卷5號（1994），頁1-39。又見氏著，《中國古代葬制的傳統と變革》（東京：勉誠出版，2000），頁79-108。氏著，《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203-227。

目前關於晉制的認識已逐漸明朗，東晉與西晉葬制間的承繼關係也顯得脈絡分明；相較之下，學界對於該如何界定西晉、十六國至北魏平城時期之間的關係則顯得較為模糊而游移。學界多同意北魏墓葬文化具有鮮明的鮮卑因素，然而在論述上仍多強調其間的連續性甚於變異性，認為北魏承漢晉制度，其為漢墓到隋唐墓葬的長期過渡階段。^⑥ 北魏典章制度多承漢晉是相關論述的基本前提，^⑦ 然而不能忽略就墓葬文化而言，北魏平城時期走向與晉制相反的厚葬方向，圖像運用的方式可視為重要指標。中原地區的晉墓中幾已不存壁畫，但在北魏建國之後開始以系統化的方式加以運用。同樣的現象也可見於寢廟與墓碑的再興起。因此，將西晉與北魏視為兩個相關但是性質不同的發展階段，應可比起視為同一階段的先後、過渡性發展，更有助於釐清北魏墓葬文化的特點。

本文第二節概觀魏晉時期墓室形制與隨葬品的特徵；第三節考察墓葬圖像的主題、配置的變化以及墓奠對於圖像布局的影響。第四節以薄葬論與招魂葬議作為線索，考察魏晉時期生死觀的轉變與發展，討論的焦點在於如何看待墓室的性質、靈魂與墓室的關係，以及如何由薄葬觀中發展出新型的靈牀。第五節探討西晉至北魏墓葬文化的變遷，概觀拓跋鮮卑生死觀的變遷，探究魏晉時期已式微的建廟立碑如何在拓跋鮮卑的喪葬活動中獲得新的政治地位，並進而發展出可稱為「平城型厚葬」的墓葬文化。為求深化墓葬圖像研究，最後提出「圖像觀」的議題，嘗試兼顧鮮卑故俗、佛教信仰、漢晉文化等多重因素，先以較為宏觀的視野來考察拓跋鮮卑如何學習觀看圖像的歷史過程，並進一步於此大脈絡下來理解其墓葬圖像的觀看／運用方式。

⑥ 楊泓，〈魏晉北朝墓葬〉，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頁543-544。李梅田，〈平城地區北魏墓葬研究〉，收入《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67-178。韋正，《魏晉南北朝考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0。倪潤安，〈北魏平城時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轉型〉，《考古學報》，2014年1期，頁33-66。

⑦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

一、墓葬形制與隨葬品

魏晉時期中原地區盛行薄葬，墓葬形制出現由複雜到簡略、由多室走向單室的變化。東漢墓中所見功能分化的多室墓結構延續至魏晉時期，不過耳室的規模已大為縮小。^⑧ 曹魏正始至西晉泰始年間出現大型的双室墓與三室墓，到了西晉中晚期，在洛陽一帶的大型、中型墓葬均出現以方形單室墓為主流的現象。曹魏時期中原地區隨著葬品陶俑的種類與組合出現新的變化，以牛車為中心的男女侍俑、武士俑、鞍馬、鎮墓獸等陶俑組合逐漸成為定式。曹魏正始八年（247）洛陽澗西16工區M2035號墓可作為曹魏後期墓葬的代表，其隨葬品可分為祭奠用器、庖廚類明器、家禽動物俑、男女侍俑等四組，表現出隨葬品的新組合。^⑨ 此墓有前後二室，前室還附有兩個耳室，具有「前堂後寢」的布局（圖1）。此墓曾被盜，不過整體看來隨葬品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嚴重的擾動，可大致推測原來陳設的位置。

此墓中出土遺物65件，其中大多數的隨葬品如陶碗、陶罐、陶灶、陶井、陶狗、陶雞等放置於前室的北耳室，男女陶俑各一件，同樣放置於此。南耳室中有陶罐、陶碗，數量較少。前室甬道口北側放有一件高44公分的鐵燈。前室中央偏後側與北側散置9件鐵帷帳架的構件，可加以復原（圖2）。同一範圍內擺設了銅博山爐、玉杯各一件以及兩件陶燈碗。帷帳座的陳設與南北耳室有所區隔，可視為墓內設奠的遺存。^⑩

⑧ 甘肅省文物隊等，《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4。

⑨ 李宗道、趙國璧，〈洛陽16工區曹魏墓清理〉，《考古簡訊》，1958年8期，頁51-5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4期，頁313-318。徐殿魁，〈試述洛陽地區曹魏墓的分期問題〉，《中原文物》，1988年4期，頁30-33、45。有學者認為此墓年代應晚至西晉早期。朱亮、李德方，〈洛陽魏晉墓葬分期的初步研究〉，收入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陽考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頁278-290。

⑩ 楊泓，〈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頁64。楊泓，〈考古學所見三國文化〉，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千古英雄—大三國特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0），頁12-21。

西晉墓中所出土的陶俑可分為鎮墓俑、出行儀仗、侍者與舞樂、庖廚類等四組。^⑪ 第一組的鎮墓俑包括鎮墓獸與武士俑，第二組出行儀仗以牛車與鞍馬為中心。這類的隨葬品組合主要見於以西晉洛陽為中心的北方地區。洛陽春都路編號IM1569由墓道、甬道、墓室所組成，墓室近正方形，墓門朝南（圖3）。由於未遭盜掘，隨葬品位置清楚，為典型的西晉中晚期墓葬。^⑫ 墓室中央陳設陶2件、陶盤1件、陶奩1件。陶盤內有陶耳杯1件，奩內有一勺。隨著墓室形制的簡化，隨葬品集中放置於墓室中央處或靠近東西兩壁。

江南地區三國吳、西晉墓仍保留漢風，盛行厚葬，以穹隆頂的雙室墓最具特色；不過到了東晉雙室墓大為衰退，平面呈凸字形、具有短甬道的卷頂單室墓成為主流。^⑬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王廙墓，322卒）為東晉初年的典型墓葬，顯示出隨著僑姓士族南渡，西晉葬制在江南地區的實踐與變遷。此墓為穹隆頂單室墓，墓室長3.9、寬3.22、高3.42公尺（圖4）。^⑭ 墓門處擺放長方形几案，案上安放凭几、陶盤、陶耳杯、陶硯、青瓷香燭、青瓷唾壺各一件，可知為墓內設奠之陳設，用以作為靈魂憑依之處，具有神坐的象徵性。^⑮

⑪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收於《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268-276。又收入氏著，《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頁126-139。

⑫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春都路西晉墓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10期，頁26-34。另可參考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谷水晉墓（FM5）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9期，頁41-48。

⑬ 東晉南朝墓葬的概觀參見羅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羅宗真、王志高，《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Albert E. Dien, *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4-162. 中譯見丁愛博（Albert E. Dien）著、李梅田譯，《六朝文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23-174。

⑭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11期，頁23-41。

⑮ 小南一郎，〈神亭壺と東吳の文化〉，《東方學報》，65冊（1993），頁223-312。江介也，〈江南地區六朝墓における副葬品配置—埋葬空間の機能構成—〉，《考古學と信仰》同志社大學考古學シリーズVI（1994），頁517-538。

象山7號墓隨葬器物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相類，可與西晉至東晉初賀循（260—319）所列的明器相比對。^{①⑥} 賀循為江東士族，會稽山陰人，以禮學傳家，拜太常，對於東晉宗廟禮儀多有建樹。^{①⑦} 賀循依據的禮制系譜尚有諸多不明之處，然值得注意的是薄葬傾向。據《晉書》卷六十八〈賀循傳〉：

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①⑧}

西晉初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仍保留孫吳厚葬之風，賀循加以革除，其所據無疑是曹魏以來統治階層所標榜的薄葬。由此看來，以西晉禮制為主體的賀循喪禮可能是一套將薄葬的習俗加以規範化，具有薄葬意義的禮制。結合東晉墓的出土品來看，其中關於「凭几一、酒壺二、漆屏風一、三穀三器、脯一筐」等描述應是指墓內設奠所用的成套器物。^{①⑨}

就隨葬品來看，在象山7號中出土金剛石指環、玻璃等高級奢侈品，並不符合薄葬，然若就其遵循的禮制來看，卻又具有薄葬意義。這種表面上似乎互相矛盾的現象實具有深意，涉及葬俗、禮制化薄葬以及社會實踐之間的多重關係。這種一方面採用薄葬禮制，另一方面又藉由各類奢侈品與不同等級的器物來彰顯墓主身分的作法，豐富了吾人對於兩晉薄葬實踐的認識。^{②⑩}

①⑥ 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1973年4期，頁36-50。蔣贊初，〈關於長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96-205。收入氏著，《長江中下游歷史考古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74-84。中村圭爾，〈江南六朝墓出土陶瓷の一考察〉，收入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頁83-135。又收入氏著，《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323-383。

①⑦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824-1831。

①⑧ （唐）房玄齡等，《晉書》，頁1824。

①⑨ （唐）杜佑，《通典》卷86·禮46·凶禮8（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2325-2326。

②⑩ 關於東晉墓隨葬品的等級問題參見謝明良，〈從階級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998年5期，頁1-40。收入顏娟英主編，《美術與考古》上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137-174。又收入氏著，《六朝陶瓷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407-433。

十六國時期遼東地區出現採用游牧民族葬俗的墓葬，對於認識北魏平城墓葬文化的淵源提供了有益的線索。遼寧朝陽後燕建興十年（395）昌黎太守崔暹墓的土壙南北長5.8、東西寬3.95公尺，石槨前寬後窄，長4、寬1.46公尺，槨室由多件石板所組成（圖5）。^①石槨北部置有一木棺，形制亦呈前寬後窄。崔暹出自清河崔氏，為北方士族的代表，其墓為土壙石槨墓，採用慕容鮮卑一系的葬俗。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太平七年（415，北魏神瑞二年）馮素弗夫婦墓為銜接十六國至北魏的重要墓葬（圖6）。^②馮素弗為北燕王馮跋（409—430在位）之弟，其墓（一號墓）中除了出土石槨、彩繪木棺之外尚有玻璃器、金冠飾等隨葬品。墓壙朝西，長8.1、前寬5.2、後寬4.46米，西壁上方挖出一內凹的龕臺，龕內除了安放釉陶壺、灰陶罐各一件之外另置有牛腿骨與肋骨，可知此龕具有殉牲的功能。這種殉牲的葬俗與中原墓中設奠的差異除了祭品、祭器的種類之外，還在於僅以棺槨為對象，並未另外陳設神坐。

二、墓葬圖像的變遷

（一）主題與配置

魏晉時期中原地區的壁畫墓幾已消失，主要保留於河西與遼東地區，然規模已大幅縮小，無法與東漢壁畫墓相提並論。魏晉時期壁畫墓的圖像主題與風格大致承繼東漢壁畫墓，但是在圖像配置上出現重組與汰選的現象，簡化天界的表象，也並未描繪歷史故事。

甘肅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編號M133中瑞祥、四神等天界圖像未配置於墓室天井，是以左右對稱的方式配置在甬道外側的照牆上，此為區域性特點（圖7）。^③在照牆的最高處有門，門扉上畫有虎，門外有雙闕。門上方配置了斜格

^① 陳大為、李宇峰，〈遼寧朝陽後燕崔暹墓的發現〉，《考古》，1982年3期，頁270-274。

^② 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頁2-32。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北燕馮素弗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31-39。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45-180。

窗櫺，兩側站著牛首、雞首人身人物，推測應為西王母的侍從或天門守衛（圖8）。^{②4} 漢代畫像中多直接表現出西王母的形象，酒泉丁家閭五號墓即承襲此傳統。^{②5} 相形之下，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較為自由地重組漢代圖像，西王母並未出現。漢代的生死觀一方面將墓室作為死者的地下居所，受到泰山府君、地下主等神祇的管轄，另一方面相信靈魂得以昇天、昇仙。^{②6} 由以上壁畫墓可知類似的生死觀保留在魏晉河西地區。

雲南省昭通縣後海子霍承嗣壁畫墓由墓道、龕室、墓室所組成（圖9），根據其北壁題記，葬於東晉太元十一年至十九年之間（386—394），這是西南地區發現的唯一壁畫墓。^{②7} 墓室為方形單室墓，寬3米、高2.2公尺。天井為覆斗形，中心飾有蓮花紋石塊。北壁上層有玄武、下層為正面墓主像，左右有比例甚小的侍者。墓主右上方有八行墨書題記，記載墓主官銜等，最後一行為「余魂來歸墓」（圖10）。東西兩壁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有青龍、白虎、玉女，下層為排成橫列的人物、著鎧甲的騎馬武士等。青龍在西，白虎在東，位置與一

②4 曾布川寬，〈漢代畫像石における昇仙圖の系譜〉，《東方學報》，65冊（1993），頁23-221，特別是頁33-34。李淞，〈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頁169-171。趙吳成，〈河西墓室壁畫中「伏羲、女媧」和「牛首人身」、「雞首人身」圖像淺析〉，《考古與文物》，2005年4期，頁66-70。

②5 甘肅省考古研究所編，〈酒泉十六國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②6 漢代生死觀的研究參見：余英時，〈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23-143。Ying-shih Yu, “‘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m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no. 47 (1987), pp. 363-395. 中譯見余英時著，侯旭東等譯，《東漢生死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63-193。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頁198-225。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Mu-chou Poo,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曾布川寬，〈漢代畫像石における昇仙圖の系譜〉，頁179-220。孫機，〈仙凡幽明之間——漢畫像石與“大象其生”〉，收入氏著，《仰觀集：古文物的欣賞與鑑別》（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65-217。

②7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省昭通後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63年12期，頁1-5。

般的配置相反。青龍、白虎、人物行列等均朝向墓門的方向前進。

霍承嗣壁畫墓的主題與配置中的部分要素可見於其他魏晉十六國時期的墓葬。西壁上段中可見到餵食青龍芝草的女性人物，並記有「玉女以草授龍」的墨書榜題（圖11）。類似的玉女表現也可見於丁家閘五號墓南壁。昭通壁畫墓的天井中配置了一朵蓮花紋。漢代畫像與壁畫墓已可見天井蓮花紋的實例，但如昭通壁畫墓在天井中心僅配置一蓮花紋的作法，於魏晉時期才開始流行，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的前室中也可見到類似作法。

河西與遼東壁畫墓的設計是以東漢墓葬圖像的布局為框架，東晉隆安二年墓則顯示出新的構想。江蘇鎮江東晉隆安二年（398）畫像磚墓由甬道、前室、後室所構成（圖12）。^{②⑧}墓全長8.95、寬3.93公尺，後室長5.18、寬2.37公尺。大部分的畫像磚集中於後室，配置在左右與後方壁面，分成五層排列，目前殘留54件磚。每一塊磚表現單一主題，包括四神、人首鳥身像、獸面人身像等，有關人界的圖像完全被排除在外。據簡報每塊畫像磚的表面均塗黑，不過若顧及氧化的可能性，其原貌仍待考。

東晉隆安二年墓後室中的四神並未完全依照方位配置，東西兩壁均有朱雀、青龍、白虎。玄武僅出現在北壁，顯示出具有對應方位的意識。就這點而言，該墓室空間仍可視為一小宇宙，具有天界表象的意義。此墓磚畫主題的排列並不均整，但正面獸面像的安排特別具有規律性。獸面像呈正面，張目、露齒，兩臂舉起，有三爪。頭上戴一蛇狀物，身軀布有鱗狀紋路，兩端為朝向兩側的人首，接近前方的獸爪，似有戴冠。其形象類似人首蛇身的「地軸」。^{②⑨}畫面兩端下角各有一株小樹，樹葉做梳齒狀，左右對稱（圖13）。同一主題的畫像磚計有3件，一件位在西壁中央，另外二件在北壁中央，均排列在各壁面的中軸線上。由於此畫像兩側並無裝飾帶，其比例顯得較其他畫像大，也更為醒目。就位置與尺寸來看，獸面戴蛇像可視為此墓的中心圖像，其圖像配置有意

②⑧ 鎮江市博物館，〈鎮江東晉畫像磚墓〉，《文物》，1973年4期，頁51-58。

②⑨ 高句麗永樂十八年（408）德興里壁畫古墳後室天井北壁繪有雙首一身的神獸，榜題為「地軸一身兩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朝鮮畫報社編，《德興里高句麗壁畫古墳》（東京：講談社，1986），頁75。南秀雄，〈高句麗壁畫の地軸像〉，《古文化叢談》，第30集（中）（1993），頁945-952。

強化鎮墓功能。

(二) 壁畫與墓內設奠的關係

隨著魏晉時期墓葬文化的轉變，墓中祭奠具有新的重要性，開始出現配合祭奠的壁畫配置。以下舉出朝陽袁臺子壁畫墓、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北京石景山八角村墓等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墓內設奠與壁畫配置的關係並不一定，在不同的區域墓葬傳統下呈現出多樣性。

1. 遼寧省朝陽袁臺子壁畫墓

四世紀遼寧省朝陽袁臺子壁畫墓由墓道、墓門、耳室、壁龕所組成（圖14）。墓室前寬3、後寬1.8、深4公尺，東耳室長1.6、寬1公尺。墓室前方西側壁龕高1.06、寬0.62、深0.2公尺。^{③①} 墓室前側西龕前可見到4件鍍金銅帳座的配件，附著有紫色殘絹，殘存墨色彩繪。附近出土4件礎石，形成一矩形範圍。在這範圍內出土一件大型漆案，高17.5、寬42.6、長64公分，上方安放了14件食器。由此可推測原來為一帳座，外有帳幕，帳內陳設大型漆案（圖15）。西側壁龕中繪有呈正面的墓主圖像，墓主身後有兩位侍女以及圍屏（圖16）。^{③②}

值得注意在西壁的前側壁面上方繪有高1.16、寬1.04公尺的《奉食圖》（圖17）。《奉食圖》中的人物捧著放有耳杯的案、樽、魁、勺等食器，朝向壁龕中的墓主圖像。據報告書，第五、六人物的頭部上方可見墨書題記「二月己……子……殯背万……墓……墓奠」，以楷書書寫。^{③③} 題記中的「墓奠」

^{③①}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朝陽地區博物館文物隊、朝陽縣文化館，〈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文物》，1984年6期，頁29-45。

^{③②} 墓主圖像的研究參見鄭岩，〈墓主畫像研究〉，山東大學考古學系編，《劉敦愿先生紀念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頁450-468。收入氏著，《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68-194。

^{③③}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朝陽地區博物館文物隊、朝陽縣文化館，〈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頁40。

可以與帳座、漆案互證，可知後者為墓內設奠的陳設。由此可知，這幅《奉食圖》表現出將墓奠進獻給墓主的情景。描繪《奉食圖》並寫下有關墓奠的題記，其目的不僅是作為一種記錄，可能還具有確保死者得以享用墓奠的意圖。這也就涉及墓葬壁畫的宗教功能問題，透過將祭奠活動予以圖像化，可能有助於強化死者神靈的感應。

由此看來，袁臺子壁畫墓中將墓主圖像置於墓室前方，應當與陳設在該範圍的墓奠有關。將墓主圖像置於接近前室入口的龕室之中，是為了配合墓奠活動，讓墓主得以更直接地接受喪家禮拜。管見所及，在漢代壁畫墓中尚未見到將墓主圖像配置接近墓門的例子。在袁臺子壁畫墓中，正面墓主圖像的模式繼承自東漢壁畫墓，但是配置的位置不同。墓主圖像成為墓內設奠的視覺對象，與帳座相對應，小龕、墓主圖像與帳座等器具共同構成一具體而微的祭奠空間。

將墓主圖像置於接近前室入口的龕室中的作法，也可見於其他的遼東壁畫墓，已成為模式化的配置。遼寧遼陽棒臺子屯壁畫墓由三個棺室、左廊、右廊、左右耳室、後耳室所組成（圖18）。^③墓室以平滑的石板建造，左右寬8、深6公尺。左右耳室位在近於墓門的左右兩側，左右耳內都畫有一位墓主宴飲的場面，墓主前方有榻與食器，背後設有屏風（圖19）。在墓門內側的左右兩壁繪有百戲、樂舞，其中人物均朝向耳室內的墓主。《出行圖》分為上下兩段，以朱線為界，繪於右廊周圍以及左廊左壁。另外在後廊左壁繪有《宅第圖》，後耳室內的三壁繪有《庖廚圖》。在此墓的圖像配置中，左右耳室內的墓主圖像與百戲、樂舞相搭配，位在墓室近墓門處，其他的主題則位在後方。

遼陽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壁畫墓由兩個棺室與左右耳室所組成，兩個耳室的位置近於墓門。^④左耳室內有墓主夫婦宴飲圖，墓主夫婦相對，中央有一侍女，上方掛有帷幕（圖20）。右耳室描繪有《庖廚圖》與《出行圖》，《出行圖》延伸至耳室的外側。三道壕窯業第二現場的令支令墓中，墓主夫婦畫像同

^③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5期，頁15-42。東潮，〈高句麗考古學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頁287-319。

^④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頁28-34。

樣配置在接近墓門的右耳室內，《庖廚圖》位在墓門左側。^{③⑤} 遼陽上王家村壁畫墓由前廊、左右耳室與兩個棺室所組成（圖21）。右耳室正壁描繪正面墓主圖像，耳室內還設有高52公分的明器臺，放置2件陶盤（圖22）。^{③⑥}

若將以上遼陽壁畫墓的圖像構成加以歸納，可知墓主夫婦畫像置於前側耳室中為最常見的模式，《庖廚圖》與《出行圖》等其他主題的位置則有所變化。張小舟曾注意到右耳室通常大於左耳室並繪有墓主宴飲圖的現象，東潮認為這表現出「坐西朝東」，以西為尊位的禮制。^{③⑦} 此外，這類繪有墓主圖像的耳室多位在墓室前端，推測應是為了便於喪家陳設祭奠。

2. 甘肅省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中編號M37、M39、M133三座墓中設置了「供臺」。此供臺應是作為墓奠用。編號M133由墓道、墓門、照牆、甬道、前室、兩個壁龕、北耳室、後室所組成（圖23）。^{③⑧} 前室北側有一深0.64、寬1.3、高1.16公尺的壁龕（圖24），龕內敷草拌泥，塗白，描繪黃色的屋型帷帳。帷帳頂部有鸚鵡、龍首，下端有龜。前室西壁還鑲嵌樓閣、穀倉、表現莊園生活的畫像磚。壁龕內的供臺上鋪有草蓆，陳設陶盤1件，位置偏外側。供臺前方另有1件陶盤，安放了2件陶耳杯、陶碟於其中，耳杯置於碟上。陶盤外側有陶燈、陶壺各1件。報告書中稱此壁龕為「供祭之龕」，十分貼切。^{③⑨} 此壁龕位在前室近墓門

③⑤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頁34-37。

③⑥ 李慶發，〈遼陽上王家村晉代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7期，頁60-62。

③⑦ 張小舟，〈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頁35。東潮，《高句麗考古學研究》，頁316-317。

③⑧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31-39。

③⑨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39。巫鴻曾指出此空位是為靈魂所設。Wu Hung, "A Deity Without Form: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on of Laozi and the Concept of Wei in Chinese Ritual Art," *Oriental Art*, 34.4 (2002), pp. 38-45. 中譯見〈無形之神：中國古代視覺文化中的“位”與對老子的非偶像表現〉，收入巫鴻著，鄭岩、王睿編，《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509-522。

處，位置與袁臺子壁畫墓或石景山魏晉墓的石龕相近。

編號M37由墓道、墓門、照牆、甬道、墓室、耳室、壁龕所組成，為一單室墓，長3.5、寬3.58、高3.46公尺（圖25）。供臺位在墓室內側（東壁）中央，長0.7、高0.16公尺。供臺後方的壁面（東壁）同樣描繪有黃色屋型帷帳，距墓底高1.16-1.05、寬1公尺，帷帳頂部有相對的鸛鵒、龍首（圖26）。帷帳內側塗白，未見任何圖像。供臺前有1件陶盤，上置陶碟2件、陶鉢1件。另外在接近北側木棺棺首之處有1件陶盤，盤上有陶碟、陶鉢、漆耳杯、陶耳杯，旁有一銅燈。這些陳設可能都與墓奠有關。

編號M37中另有兩項值得注意的特徵：第一、原先在屋型帷帳壁畫前應該還掛有帷帳（圖27）。在南、北兩棺後部放置一木棍，發掘時此木棍已彎曲。此木棍橫跨兩棺，在靠近兩棺處殘存素紗，原本應是作為帷帳。由於北側棺的位置較高，木棍的位置北高南低。由此高度來看，原來所懸掛的帷帳正好可遮住後方的屋型帷帳壁畫，帷帳與壁面之間相距約30公分。第二、供臺由多塊磚所砌成，正面中央形成寬約60、深約10公分的凹痕。此特徵在報告書中雖未提及，但於平面圖、橫剖視圖、彩版中均可清楚地辨識出來。^④此供臺的正面結構可能是模仿牀座，作為上方屋型帷帳的臺座使用。由此可知編號M37中墓內設奠的陳設頗為複雜，除了屋型帷帳壁畫、仿牀座的供臺之外，還用木棍懸掛了實物帷帳。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中編號M133、M37中設有供臺、描繪帷帳，但是並未表現出墓主圖像，這意味著不以墓主圖像作為墓內設奠的視覺中心，與朝陽袁臺子壁畫墓形成對照。此外，編號M37在屋型帷帳壁畫之前覆蓋一層帷帳的作法，頗為耐人尋味。推測其功能在於區隔並界定出神魂所憑依的幽密空間。在木棺後端懸掛帷帳，亦可建立木棺與供臺之間的連帶性。至於原來是否曾在供臺上安放木製神主一類的器具以作為墓主圖像的替代物，現已無法而知。這種排除墓主圖像僅表現空帳的作法，目前似僅見於敦煌佛爺廟灣，未見於嘉峪關魏晉墓或丁家閘五號墓。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顯示出墓內設奠與壁畫的另一種可能的關係。在此未將祭奠空間與墓主圖像相結合，採用僅描繪出帷帳的作法

^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13、17、圖版5。

來輔助祭奠的進行。

3.河北省北京石景山魏晉墓石龕

1997年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中發現一座石龕（圖28）。^{④①}墓室為朝東的雙室墓，所謂的「石龕」位在前室的北側。石龕並無前板，由後壁、左右壁、地板、頂板等五塊石板所組成。地板寬1.3、深0.7，後壁高1.15、寬1.36，東西壁高1.15、寬0.85公尺。頂板為廡殿式，檐部有五個獸首與四個朱色圈紋，模仿屋簷的前緣。石龕後壁描繪墓主的正面坐像，頭戴平頂冠，右手執麈尾，前方有凭几，兩側各有一位侍女（圖29）。西壁分為上下二段，上段為《牛耕圖》，下方為《出行圖》。東壁上方似繪有帷帳，中央有曲足案。據簡報案的左側有侍女一人，然未見於線描圖。另外在石龕頂部的東西兩側分別繪有日、月。

簡報中將此石龕稱為「石龕（槨）」或「石槨」，暗示其作為石槨的可能性。石龕並無前板，正面開放，且石龕寬1.35公尺，比起死者約1.7公尺的身高顯得過短。^{④②}在後室中殘留了約50根棺釘，原來在後室中應該安放了木棺。發掘之際雖然遺骨位在石龕的東南側，位置接近，但是由棺釘分布的位置來看，死者遺體原來應該放置在後室，因此可以推測此石龕並非石槨。此石龕前側開放，其結構類似東漢的小祠堂。在思考這件石龕的功能時，由於隨葬品的位置受到擾亂，難以藉由隨葬品來考察石龕的性質，因此石龕所在位置以及壁畫配置就成為重要的線索。

參照袁臺子壁畫，推測這件繪有墓主圖像的石龕應具有類似耳室或壁龕的

④① 石景山區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區八角村魏晉墓〉，《文物》，2001年4期，頁54-59。關於此墓的年代，田立坤曾推測為北魏。不過若比較平城時期北魏壁畫墓，其壁畫風格的年代應早於北魏。田立坤，〈袁臺子壁畫墓的再認識〉，《文物》，2002年9期，頁41-48。又見倪潤安，〈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的年代及墓主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3期，頁37-61。

④② 關於死者身高的推測，參見潘其風，〈北京石景山區八角村魏晉壁畫墓出土人骨的觀察研究〉，《文物》，2001年4期，頁92-95。

功能，可能是作為舉行墓奠時的祭拜對象，即神坐所在。北京石景山墓的正面墓主圖像的表現形式繼承自東漢墓壁畫的傳統，在功能上則轉為墓奠所用，成為墓內祭祀空間的視覺中心。此石龕可說是一種建築化的帷帳座，尤其是其東壁描繪曲足案與帷帳，更提高了這個推測的可能性。

這種做為祭奠用的石龕稍早可見於內蒙古包頭市南郊召灣東漢建寧三年（170）M91墓。^④此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後室所組成，前中室的兩側各有一耳室，呈中軸對稱布局（圖30）。前室西北角有一石屋，長1.1、寬0.9、高1.1公尺。頂部垂脊刻有青龍、白虎，無右側板與前板，右前角立一石柱，為開放性空間（圖31）。由於石屋前設有長方形棺穴，顯然此石屋並非做為葬具。正如報告書所言，此石屋當與祭奠有關，具有類似享堂的功能。報告書中將石屋的基座描述為臺階式。但由圖版所見，其正面兩側有雙足，結構類似榻或牀座，似同樣可視為建築化的帷帳座。將此墓與石景山魏晉墓相比較，具體而微地顯示出東漢末至西晉墓葬文化的變遷。除了由多室墓演變為雙室之外，在石龕內描繪正面墓主圖像則顯示出魏晉墓內祭奠空間的新發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壁龕、石龕的尺寸相近。袁臺子壁畫墓西側壁龕高1.06、寬0.62、深0.2公尺；佛爺廟灣壁畫墓的帷帳圖距墓底高1.16-1.05、寬1公尺；石景山墓石龕後壁高1.15、寬1.36公尺。整體看來，其高度介於1.06至1.16公尺之間，寬度則較不固定，約為0.6至1.16公尺。推測此相當於喪家設奠、跪拜時視線所及的高度。

石景山墓石龕北壁描繪墓主圖像，東壁僅描繪空帳與案。單就這兩個元素來看，其壁畫配置似乎兼具袁臺子壁畫墓與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在表現墓奠上的特色，墓主圖像與空帳兩者並存。

④ 包頭市南郊張龍圪旦墓中室中也同 設有石屋。魏堅編，《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253-273。

三、魏晉生死觀與葬俗的變化

(一) 薄葬論的興起

魏晉時期墓葬文化的特徵之一在於薄葬的趨勢，首先出現在北方中原地區。^{④④} 曹魏首先施行薄葬政策，建安十年（205）曹操（154—220）平定冀州後隨即下令禁厚葬。^{④⑤} 據《宋書》卷十五〈禮志〉：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④⑥}

禁碑令是與禁厚葬一併實施。即使在曹魏，禁碑的對象主要是針對私家，仍可見皇帝立碑或是經朝廷特准而刻碑的例子。^{④⑦}

黃初三年（222）魏文帝曹丕（187—226）持續推行薄葬改革：

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④⑧}

曹丕為申明曹操儉約之志，表達孝心，不僅拆毀曹操高陵上的寢殿，還禁止在

④④ 關於先秦至兩漢的薄葬思想系譜，參見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頁254-268。

④⑤ （晉）陳壽，《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27。

④⑥ 《宋書》卷十五〈禮志〉，頁407。曹操高陵的相關討論，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

④⑦ 劉濤，〈魏晉南朝的禁碑與立碑〉，《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3期，頁4-11。饒宗頤主編；劉昭瑞著，《漢魏石刻文字繫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頁163-164。

④⑧ 《晉書》卷20〈禮志〉，頁634。又見於《宋書》卷16〈禮志〉，頁445。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頁40。

其壽陵建造寢殿，為漢代以來陵寢制度的一大變革。^{④⑨}

魏晉時期墓葬文化中的特殊現象，是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可見到以東漢墓或祠堂的石材作為墓葬建材的例子。^{⑤⑩} 令人訝異的是這種現象甚至出現在孫吳宗廟。孫權為其父孫堅於長沙郡臨湘縣（今湖南長沙）立宗廟，修築過程中利用了西漢長沙王吳芮墓的建材。^{⑤⑪}

魏晉時期薄葬論的基本論調繼承自東漢。《禮記》〈檀弓下〉中載「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⑤⑫} 基於此一觀點來考慮，由於魂並不停留於墓室內，與其厚葬不如選擇薄葬。^{⑤⑬} 東漢楊王孫承繼這樣的看法，討論了薄葬的生死觀：

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⑤⑭}

④⑨ 不過如同陳思王曹植（192—232）墓所見，雖遺令薄葬，但仍有一定的規模，可知薄葬內涵的複雜性。劉玉新，〈山東省東阿縣曹植墓的發掘〉，《華夏考古》，1999年1期，頁7-17。

⑤⑩ 中原地區利用漢墓石材所造的魏晉墓實例可舉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南陽東關晉墓〉，《考古》，1963年1期，頁25-27。王儒林，〈河南南陽西關一座古墓中的漢畫像石〉，《考古》，1964年8期：頁424-426。南陽市博物館，〈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誌畫像石〉，《文物》，1974年8期，頁73-75、41。南陽市博物館，〈南陽市王莊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3期，頁26-35。藉由禮制改革所作的解釋參見巫鴻，〈漢明、魏文的禮制改革與漢代畫像藝術之盛衰〉，《九州學刊》，3卷2期（1989），頁31-44。收入巫鴻著，鄭岩、王睿編，《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上冊，頁274-286。

⑤⑪ 《宋書》卷16〈禮志〉，頁445。又見於陳橋驛著，《水經注校釋》卷38〈湘水〉（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664。此事的分析見陳戍國，《魏晉南北朝禮制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頁6。

⑤⑫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 5 禮記》（臺北：商務印書館，2011），頁195。

⑤⑬ 曾布川寬，〈秦始皇陵と兵馬俑に関する試論〉，《東方學報》，58冊（1986），頁355-461，特別是頁417-418。收入氏著，《中國美術の圖像と様式》研究篇（東京：中央公論社，2006），頁3-62。

⑤⑭ 《漢書》卷67〈楊王孫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2908。

楊王孫並批評了厚葬，認為厚葬無益於死者回歸天地、返真或「歸真」。歸真意為與道合一，顯示出薄葬與道家思想的相關性。^{⑤⑤}

皇甫謐（215—282）〈篤終〉之中同樣說明了與楊王孫的魂歸天、形歸於地相同的想法。

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知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⑤⑥}

文中起首就將魂神與身體相對比，魂神屬天，身體歸於地。身體埋入土中為「反真之理」。由這個角度來看，身體之外的衣衾、棺槨都反而成為「隔真」的贅物。皇甫謐並認為以死者如同生前一般生活的觀念來安置死者，並不符合靈魂的本質。厚葬不但對死者之靈無所助益，反而帶來盜墓的禍害。這顯然是對於漢代厚葬風氣的批評。^{⑤⑦}

魏文帝《終制》認為死後無知，由生死觀的層面說明薄葬的合理性：

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⑤⑧}

⑤⑤ 參照吉川忠夫，〈魂氣の如きはゆかざるなし〉，頁36-39。又見吉川忠夫，〈宗教に傾斜する心性〉，收於氏著，《中國人の宗教意識》（東京：創文社，1998），頁213-269，特別是頁218。

⑤⑥ 《晉書》卷51〈皇甫謐傳〉，頁1416-1417。

⑤⑦ 楊王孫與皇甫謐的薄葬論的特點，在於將寄託於文字的思想具體化並加以實踐。吉川忠夫，〈皇甫謐の《篤終論》〉，財團法人東方學會，《東方學界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財團法人東方學會，1997），頁1187-1200。又見Keith N. Knapp, "Heaven and Death According to Huangfu Mi, A Third-century Confucian," *Early Medieval China*, 1 (2000), pp. 1-31.

⑤⑧ 《三國志》卷2〈魏書·文帝紀〉，頁81-82。

墓室並非靈魂所居之處，墓祭不合乎禮的規範。死者不居住於作為地下世界的墓室，豪奢的棺槨與華麗的衣衾，僅是無益之物。其中「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的想法，正與皇甫謐〈篤終〉「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相呼應。另外，「魂而有靈、無不之也」的主張是出自《禮記》〈檀弓下〉。

十六國時期的君主則擺盪於厚葬與薄葬之間。前趙劉聰（在位310—318）遺命：「朝終夕殮，旬日而葬」。^{⑤⑨} 劉曜（在位318—328）厚葬其父及妻，「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⑥⑩} 後趙石勒（在位319—333）為避免發塚之禍，遺命：「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趁夜將屍柩瘞埋於山谷，不知所在。^{⑥⑪}

後燕、北燕君主較傾向薄葬。後燕慕容垂（在位383—396）遺令：「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⑥⑫} 北燕馮跋（在位409—430）明確地繼承曹魏的薄葬論，《晉書》卷一二五〈載記〉：

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⑥⑬}

馮跋以薄葬論為根據，否定厚葬的意義，「因舊立廟」，不再新建陵寢。文中將「精魂」與「骨肉」相對比，精魂歸於天，骨肉歸於地。同樣認為死者無知，厚葬無助於亡者，卻有損於生者。否定死者死後居住於地下墓室，因而從根本上駁斥了厚葬的效用。類似的生死觀也可見於東晉招魂葬議。

（二）東晉招魂葬議

^{⑤⑨} 《晉書》卷125〈載記·劉聰〉，頁2677。

^{⑥⑩} 《晉書》卷125〈載記·劉曜〉，頁2693。

^{⑥⑪} 《晉書》卷125〈載記·石勒〉，頁2751-2752。

^{⑥⑫} 《晉書》卷125〈載記·慕容垂〉，頁3090。

^{⑥⑬} 《晉書》卷125〈載記·馮跋〉，頁3131。

招魂葬作為一種特殊的葬俗可以追溯至東漢，但是在魏晉時期開始出現新的重要性。^{⑥4} 東晉招魂葬議對於理解魏晉時代生死觀的變遷、死後的形神關係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所謂招魂葬，意指因戰爭或災禍等特殊條件，在屍體無法保全或保留的狀況下，喪家將死者靈魂招到墓中的葬法。^{⑥5} 「招魂」在《禮記》等典籍中有明確的記載，但未見「招魂葬」。招魂葬議的論爭焦點在於如何界定墓室的性質：究竟墓室是作為埋藏死者遺體之用，亦或是靈魂所歸之所。議論的焦點指向墓中靈座的功能問題。

東晉招魂葬議主要可見於《晉書》卷五十九〈東海王越傳〉。東海王越亡於永嘉五年（311），靈柩為石勒所焚。其妃裴氏歷經苦難後於太興年間（318—321）流離至江南，欲為東海王越行招魂葬，距離當初已將近十年之久。東晉元帝徵詢博士傅純，傅純言：

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⑥6}

⑥4 關於招魂葬的研究，參見牧尾良海，〈招魂葬考〉，《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2號（1978），頁1-15。東晉招魂葬議論在禮學上的意義，參見木島史雄，〈招魂をめぐる禮俗と禮學〉，《中國思想史研究》，13號（1990），頁35-62。向井佑介，〈墓中の神坐—漢魏晉南北朝の墓室内祭祀—〉，《東洋史研究》，73 1號（2014），頁19-21。何惠鑑曾嘗試將魂瓶（穀倉罐）的功能與招魂葬相連結，不過正如阿部賢次（Stanly K. Abe）所言，其證據不足。Wei-kam Ho, “Hun-p'ing: The Urn of the Soul,”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48.2 (1961), pp. 26-34. Stanley K. Abe, *Ordinary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90.

⑥5 魏晉之前的招魂葬史料可見於（宋）范曄，《後漢書》卷十五〈鄧晨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584。

⑥6 《晉書》卷59〈東海王越傳〉，頁1626。

祔祭為祭於門內的禮儀。^{⑥7} 傅純強烈批評招魂葬的謬誤，申論形神與墓廟之間的對應關係。具有形體的身體葬於墓中，魂神祭於祠廟，所謂「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傅純以此為前提，認為墓室無法安葬靈魂，批評招魂葬混淆了形神之別。此外文中也批評漢代以來墓祭的風氣。既然墓中無法安置靈魂，墓祭也就沒有任何意義。

最後東晉元帝聽從傅純的建議，下詔不許。不過裴妃並未奉詔，葬東海王越於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後來墓毀，又改葬於丹徒（今江蘇省鎮江市東南）。^{⑥8} 裴妃在皇帝的禁令下仍舉行兩次招魂葬，這顯示了東晉南渡之際皇權的衰微，也可知招魂葬有其喪葬活動上的實際需求。

與傅純相同的見解可見於其他反對招魂葬的議論。例如江淵同樣主張墓並無法收納死者的靈魂，而是作為安置死者形體之用：

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屍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⑥9}

埋葬僅限於埋藏屍柩，不是為了收納神魂。傅純與江淵的主張代表了當時反對招魂葬的基本論點。同樣反對招魂葬的王裳提出以下法：

裳引墓中靈座為証，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耳。^{⑦0}

墓中雖然設有靈座，但是並非作為靈魂所居之處。神座又稱靈座，由神主、几筵所組成。關於魏晉時期神坐（座）的實例，可參考自銘神坐的刻石，例如《鮑捐神坐》與《鮑寄神坐》。《鮑捐神坐》（圖32a、32b，北京故宮博物院

^{⑥7} 《禮記》卷24〈禮器〉：「設祭于堂，為枋乎外。鄭玄注：祔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內之旁同名焉。」（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 5 禮記》，頁472。

^{⑥8} 《晉書》卷59〈東海王越傳〉，頁1626。

^{⑥9} 《通典》卷103·沿革63·凶禮25，頁2704。

^{⑦0} 《通典》卷103·沿革63·凶禮25，頁2701。另外干寶也有相同的見解。干寶，〈駁招魂葬議〉：「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有為魂神也。」（頁2702）。

藏)高34.5,寬7.8公分,《鮑寄神坐》高30.5、寬7.8公分,原來應該作豎立狀。⑦①

《鮑捐神坐》的內容為「魏故符節僕射陳郡鮑捐之神坐」,以隸書銘記墓主的官銜、地望、名諱。

贊成招魂葬者則認為由於墓中設有靈座,因此墓室可依附神魂,並以此作為招魂葬有効性的證據。李瑋〈宜招魂葬論〉中言:

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形也。⑦②

李瑋舉出當時墓室中實際安置的靈座、几筵與祭品作為證據,認為墓室不僅止於安置死者的形體。又據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

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⑦③

墓中的神座與廟中的木主同樣作為靈魂憑依的對象。⑦④ 文中最後指出招魂葬存

⑦① 羅振玉,《芒洛塚墓遺文 四編 補遺》中有載,參見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 第一輯》卷19(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頁14308。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第三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圖版3、4。下中邦彥編集,《書道全集 第三卷 中國3 三國・西晉・十六國》(東京:平凡社,1959),頁172。

⑦② 《通典》卷103・沿革63・凶禮25,頁2703(標點略有調整)。

⑦③ 《通典》卷103・沿革63・凶禮25,頁2703-2704。

⑦④ 神坐與木主的研究參見:劉昭瑞,〈記幾件漢魏神座石刻〉,《考古與文物》,2002增刊,頁222-226、239。收入氏著,《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408-417。吾妻重二,〈木主について——朱子學まで〉,收入福井文雅博士古稀退職記念論集刊行會,《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儀礼》(東京:春秋社,2005),頁143-162。吾妻重二著;吳震編;吳震、郭海良等譯,《朱熹《家禮》實證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159-175。邢義田,〈陝西旬邑百子村壁畫墓的墓主、時代與「天門」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3卷3期(2006),頁1-38。收入氏著,《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631-677。向井佑介,〈墓中の神坐—漢魏晉南北朝の墓室内祭祀—〉,頁1-34。

在的必要性，在於讓孝子表達哀傷之情。這一點顯示出贊成招魂葬的意見，實由喪家的立場來考慮。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無論贊同或反對招魂葬，雙方論點均集中在「墓中之座」或「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這種論述的方式正傳達出當時士人對於墓葬本質的認識。前引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言：「墓中之座，廟中之主」，將神坐與木主並列，認為墓中無木主，但是設有神坐。關於西漢以來墓葬中祭祀空間的發展，學界已論之甚詳。^{⑦⑤} 在魏晉招魂葬議中更為明確地強調出墓中神坐的地位。這種對於「墓中之座」或「靈座、几筵、飲燕之物」的重視，可與這一時期墓中設奠的葬俗相互呼應。

此外，從支持薄葬論及反對招魂葬這兩種立場的看法中，可尋得一種共通的生死觀，其接近前述魏文帝〈終制〉中「冢非棲神之宅」的概念。墓室僅是作為收納死者身體的空間，並非靈魂所居之處，與漢代厚葬中所見將墓室視為死者地下宅第的生死觀形成對比。^{⑦⑥} 招魂葬在東漢已經出現，不過直到魏晉時期才形成足以挑戰既有禮制的行為，具有墓葬文化變遷的意義。

（三）薄葬與靈牀

薄葬墓中必須安置可供神魂憑依之物，這是魏晉時期薄葬的底限。^{⑦⑦} 西晉王祥（184—269）的遺令中表現出具有魏晉墓葬文化特色的薄葬內涵。據《晉書》卷三三〈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

^{⑦⑤} 黃曉芬，《中國古代葬制的傳統與變革》，頁79-108。氏著，《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頁203-217。Lai Guolong,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ese Relig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pp. 90-97.

^{⑦⑥} 就隨葬品種類的變化來看，西晉末至東晉初象徵地下生活的模型類明器逐漸衰退，可能與生死觀的轉變有關。蔣贊初，〈關於長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頁79。

^{⑦⑦} 向井佑介，〈墓中の神坐—漢魏晉南北朝の墓室内祭祀—〉，《東洋史研究》，頁16-18。

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梓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繡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⑦⑧}

首先對於死生之理表現通達的態度，其次逐一減省沐浴、纏屍等儒家喪禮禮俗，不以生前受賜的玉佩、玉玦、綬笥等入殮。墓中有棺槨，與一般葬式相同，差別之處在於限制棺槨的大小並簡化墓室的規模與隨葬品，不設前堂、几筵。由文意看來，几筵原應設在前堂，既然前堂已省，几筵也就從略。由於前堂與几筵所構成的祭祀空間仍為不可或缺，遂將之濃縮為牀榻，作為替代物。雖然形式簡化，但仍保有祭奠的功能與意義。^{⑦⑨}最後的「朝夕奠」指喪家陳設繡脯、玄酒，為初亡未下葬前的小奠。^{⑧⑩}

整體而言，王祥的薄葬是在調和儒家喪禮規範的前提下進行，更能傳達出當時士族所重視的不可省略之處。文中的關鍵在於棺前置牀榻。棺前設牀榻不見於儒家禮制，可視為受到薄葬觀影響下的權宜設施，其功能是作為神魂的憑依之處，可以說牀榻被賦予了更為集中的祭奠象徵性。棺槨乘載身體，牀榻可作為神魂憑依的對象，分別因應死後的形神分離。此處牀榻的功能相當於靈坐。進而言之，在空間上牀榻在前，棺槨在後，反映了神重於形的薄葬觀。

這類牀榻在下葬前可能曾陳設於喪禮之中，同樣用來象徵死者神魂所在。這類使用於喪禮的牀榻多稱為「靈牀」。如前述，魏武帝勵行薄葬政策，但是在其遺令中卻同樣重視設靈牀與奠祭。陸機（261—303）〈弔魏武帝文〉中有以下的文字：

⑦⑧ 《晉書》卷33〈王祥傳〉，頁989。

⑦⑨ 棺前陳設小型牀榻的配置可見於南朝墓。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橋南朝墓〉，《東南文化》，1997年1期，頁61-65。原來此牀榻可能設有圍屏。向井佑介，〈墓中の神坐—漢魏晉南北朝の墓室内祭祀—〉，《東洋史研究》，頁16。

⑧⑩ 孫詒讓，《周禮正義·天官·籩人》：「喪禮之奠有十，惟始卒及朝夕奠為小奠，其大斂、小斂、朔月、月半、薦新、遷祖奠、祖奠、大遣奠，並有牲禮，為殷奠。」（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3 周禮》（臺北：商務印書館，2001），頁84。孫詒讓，《周禮正義》三（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頁970-971。

（魏武帝遺令）又曰：吾嬖好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⑧1}

銅爵臺的堂中設八尺牀，牀上懸掛穗帳，作為祭祀的對象與死者神魂憑依的道具。若以一尺為24公分計算，八尺牀寬約192公分，其大小與日常使用的牀相近。^{⑧2} 在此牀前供奉乾肉等祭品，初一與十五日以歌舞於牀前弔慰曹操的神魂。

由此可知，在魏晉時期的薄葬禮儀中可在喪禮中設置了靈牀，下葬前拆毀或埋入墓中。在喪禮中靈牀的功能類似祭壇，為生者祭奠死者並與其靈魂交接之所。這類具有靈坐意義的牀榻與棺共同構成墓室空間。銅爵臺上用來祭奠魏武帝的八尺牀，以及王祥遺令中所見以安置牀榻來取代墓內祭祀空間的作法，代表靈牀發展的新開端，可視為薄葬觀對於魏晉喪葬文化的具體影響。

四、拓跋鮮卑葬俗的變遷

（一）鮮卑固有的葬俗

早期鮮卑的墓葬與考古研究對於鮮卑的起源、遷徙、分類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認識，顯示出北方游牧民族、人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⑧3} 鮮卑習俗與烏

⑧1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60〈弔魏武帝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2596。

⑧2 西晉永嘉元年（307）王浚妻華芳墓中出土的骨尺總長24.2公分。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王浚妻華芳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12期，頁21-24。盧嘉錫總主編；丘光明等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276-279。

⑧3 宿白，〈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一〉，《文物》，1977年5期，頁42-54。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文物》，1977年11期，頁38-46。喬梁，〈鮮卑遺址的認定與研究〉，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483-508。魏堅，〈內蒙古地區鮮卑墓葬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孫危，〈鮮卑考古學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韋正，〈鮮卑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3期，頁349-378。

丸相近，據《三國志》卷三十〈鮮卑傳〉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⑧4} 文中對烏丸的葬俗有生動的描述：

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頌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⑧5}

可知鮮卑葬俗中使用棺一類的葬具，並焚燒死者生前的乘馬、衣物、服飾以供靈魂所需。通往赤山的路途遙遠且充滿危險，為確保靈魂的安全，須由巫師頌呪，並以犬護送。這種焚燒死者衣物的葬俗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徵。^{⑧6}

在其傳統喪葬習俗中是以喪禮而非墓葬的規模來表現死者的地位。^{⑧7} 桓帝葬其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⑧8} 桓帝藉由葬母一事來廣泛聯繫各部落或有其政治考量，然應該是符合其傳統喪禮的行事。^{⑧9} 洛陽時期爾朱榮在出兵洛陽之前「欲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同樣是承襲此風。^{⑨0}

拓跋鮮卑的傳統葬俗一直延續至定都平城之後。文成帝時期高允（390—487）由儒家禮教的角度，批評當時仍為代人集團所奉行的鮮卑葬俗：

⑧4 《三國志》卷30〈魏書·鮮卑傳〉，頁835。《後漢書》卷90〈烏桓鮮卑傳〉：「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頁2985）。

⑧5 《三國志》卷30〈魏書·鮮卑傳〉，頁832-833。

⑧6 類似的記載可見於《宋書》卷95〈索虜傳〉：「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頁2322）。

⑧7 村元健一，〈北魏永固陵の造營〉，《古代文化》，52卷2期（2000），頁18-28。

⑧8 （北齊）魏收，《魏書》卷13〈文帝皇后封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322。同事又見於《魏書》卷1〈序紀〉，頁6。

⑧9 田餘慶，《拓跋史探 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235-236。

⑨0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6。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⑨①}

這一段記載頗能代表當時中原北方士族對於鮮卑傳統禮俗的看法。其中的「古式」是指漢晉傳統喪葬禮儀。高允出身勃海蓆縣（今河北省景縣），雖信奉佛法，但由儒家的角度來立論國家喪葬禮俗應有的規範。^{⑨②} 文中的「鼓舞」、「殺牲」、「燒葬」等均為鮮卑葬俗，可以與前引《三國志》卷三十〈鮮卑傳〉的記載相對應。由最後一段描述「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可想見當時皇室喪禮中焚毀死者遺物的規模浩大。

文成帝接受高允的建言，和平四年（463）十二月下詔改革婚喪禮儀，可能與此事直接相關：

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有司可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⑨③}

然而此詔的重點在於奢侈的程度逾越身分等級，並不在於改革喪禮的內容。和平六年（465）文成帝崩，葬於金陵。文明太后馮氏在其喪禮中捨身投火。《魏書》卷十三〈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

^{⑨①} 《魏書》卷48〈高允傳〉，頁1074-1075。

^{⑨②} 高允的佛教思想參見荒牧典俊，〈北魏の忠臣高允の佛教思想〉，《東方學報》，72號（2000），頁159-179。勃海高氏的墓葬參見河北省文館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3期，頁17-31。

^{⑨③} 《魏書》卷5〈高宗文成帝紀〉，頁122。

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⑨4}

此處的「故事」即是指拓跋鮮卑的傳統葬俗，正與前引高允所稱的「古式」相對。由於高宗崩時仍採焚燒御服器物的故俗，可知高允的建言並無太大成效。

(二) 寢廟與墓碑的再興起

北魏建國後代人集團一方面延續拓跋鮮卑的葬俗，同時也逐步吸收漢晉禮制，在喪葬制度上並未施行魏晉以來禁寢廟、墓碑的政策，卻是反向而行，朝厚葬的方向發展，逐步摸索並確立具有北魏特色的新規範。寢廟與墓碑的再興起尤其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1. 葬俗的新發展

拓跋鮮卑在建國之前「鑿石為祖宗之廟」，^{⑨5} 建國後仿效漢晉建陵寢、太廟。必須留意在此制度草創階段，對拓跋鮮卑而言陵寢、廟、太廟之間的區別並不十分明確，不能以漢晉陵寢、宗廟制度的標準視之。例如明元帝「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⑨6} 雲中指「雲中宮」或「雲中之盛樂宮」，為昭成帝什翼犍所築之宮城。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一帶）為神元帝力微所建，也是登國元年（386）道武帝拓跋珪即位代王後遷都平城前的據點之一。文中於三處立太廟，顯然不符合宗廟制度，但卻能因應拓跋鮮卑在政治宗教上的實際需求。由於金陵為北魏皇陵所在，推測此處的太廟可能兼具寢廟的性質。

北魏恢復寢廟、太廟是做為重構國家祀典體系的一環。在明元帝於金陵立廟之前，永興四年（412）已先在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立太祖

⑨4 《魏書》卷13〈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頁328。

⑨5 《魏書》卷181〈禮志〉，頁2738。

⑨6 《魏書》卷181〈禮志〉，頁2737。

廟，「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宮之所，各立壇，祭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⁹⁷ 永興五年（413）七月明元帝行幸薄山，「帝登觀太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⁹⁸ 天興二年（399）二月太祖曾行幸此地並「刻石記功」。⁹⁹ 明元帝又增設「石壇」以祭祀太祖。同年明元帝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¹⁰⁰ 其中皇帝行幸、刻石立碑、祭祀先王三事合為一體。北魏前期皇帝的行幸配合游牧民族春、秋二祭的作息，同時具有高度軍事意義與政治象徵性。¹⁰¹ 行幸一事以及其過程中對於先王行幸遺跡、遺物的祭祀，與北魏早期的國家建立與皇權的展演密不可分。

隨著太廟的營造與祀儀空間的改變，在漢人官僚的引導下，拓跋鮮卑也逐漸改變其對祖靈的想像。泰常四年（419）八月明元帝於白登山祭拜道武帝太祖廟，神靈有所感應：

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殷殷輾輾，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¹⁰²

博士許鍾以太祖廟北門的車騎聲作為明元帝孝心通神的明證。「孝誠之至，通於神明」出自《孝經》：「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將「悌」改為「誠」，則

⁹⁷ 《魏書》卷181〈禮志〉，頁2736-2737。

⁹⁸ 《魏書》卷1〈太宗紀〉，頁53（標點略有調整）。

⁹⁹ 《魏書》卷1〈太祖紀〉，頁34-35。

¹⁰⁰ 《魏書》卷181〈禮志〉，頁2736-2737。

¹⁰¹ 江上波夫，〈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3 匈奴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274-291。佐藤智水，〈北魏皇帝の行幸について〉，《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12卷5期（1984），頁39-53。

¹⁰² 《魏書》，卷181〈禮志〉，頁2737。

是為了配合太祖廟祭祀的情境。^⑩ 許鍾關於這件靈應事蹟的陳述可謂十分具體詳細，其用意可能是為強化明元帝繼承皇位的正當性，並間接凸顯漢晉宗廟制度的重要。由此可知，至少就皇帝而言，死後靈魂不再僅是逕歸赤山，而是被放進漢晉宗廟祭祀的脈絡。在這種新的禮制中，皇靈由車騎導從，以大駕出行的形式回到太廟定時接受祭祀。宗廟祭祀的重構也同時意味著重新界定靈魂應有的存在樣態。

到了太武帝時期為皇后建寢廟立墓碑。雖然同樣違反陵寢制度，卻能表現出北魏的特色。《魏書》卷十三〈太武惠太后竇氏〉：

真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諡曰惠，葬崢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崢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崢山，建碑頌德。^⑪

太平真君元年（440）惠太后竇氏卒，雖為太武帝乳母，但太武帝「奉養不異所生」，指定寵臣盧魯元（－442）監護喪事。惠太后竇氏遺命葬於崢山（今山西省渾源縣西北），以有別於當時北魏帝后所葬的金陵。^⑫ 並於崢山立寢廟，建碑頌德。由「可以終託」一詞來看，竇氏將其寢廟、墓葬視為靈魂安居之所。盧魯元為昌黎徒河人，曾祖仕後燕，特別受到太武帝的寵信，「工書有文才」。^⑬ 若說此碑文是由盧魯元所撰，似乎也不無可能。

⑩ 明元帝拓跋嗣殺其弟清河王拓跋紹並奪回皇位，故許鍾諱言「悌」。《魏書》卷16〈清河王傳〉，頁390。

⑪ 《魏書》卷13〈太武惠太后竇氏傳〉，頁326。

⑫ 平城時期皇后多葬於金陵。關於雲中金陵與盛樂金陵之辨，參見李俊清，〈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990年1期，頁67-74、38。松下憲一，〈「定襄之盛樂」と「雲中之盛樂」——鮮卑拓跋國家的都城と陵墓——〉，《史朋》，40號（2007），頁1-21。

⑬ 《魏書》卷34〈盧魯元傳〉，頁801。

惠太后竇氏的葬式並成為規範。高宗乳母昭太后常氏的祖籍為遼西，卒於和平元年（460）：

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⑩⑦}

其葬式依惠太后故事。雞鳴山位在廣寧（今河北省涿鹿縣）東北。其墓地的選擇可能與其出身有關。常太后為其父改葬於遼西郡，同樣「樹碑立廟，置守塚百家」。^{⑩⑧}由此可以推測由太武帝至文成帝的這段時期，樹碑立廟已成為北魏皇室墓葬文化的成規。

2. 立碑頌德的源起

北魏建墓碑以頌功德的作法可追溯至建國之前的西晉末。當時拓跋鮮卑興起自匈奴故地，在今山西北部、內蒙古南部形成一有力的部落聯盟。西晉末年征北將軍衛瓘（220—291）對拓跋鮮卑採親善策略，以此作為抵禦匈奴的屏障。^{⑩⑨}衛瓘命其門牙將衛操（—310）、衛雄叔侄投奔拓跋鮮卑，輔佐桓帝猗乜、穆帝猗盧。促成拓跋鮮卑協助西晉征討山西中部的匈奴劉淵和東南部的石趙。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眾。桓帝嘉之，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瀛公司馬騰

^{⑩⑦} 《魏書》卷13〈文成昭太后常氏傳〉，頁327-328。上述事例顯示出女性在祭祀中的地位甚高。嚴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頁199-200。

^{⑩⑧} 《魏書》卷71〈外戚上·常英傳〉，頁1817。

^{⑩⑨} 谷川道雄，〈初期拓跋國家における王權〉，《史林》，46卷6號（1963），頁48-70。張金龍，《北魏政治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6），頁6-19。谷川道雄，《增補 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頁123-134。

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⑩

衛操世居北地，出自代郡衛氏，故文中稱代人。衛操與其子雄、宗族鄉親投奔拓跋部，其目的在於藉由來「匡助晉氏」，鞏固北邊國防。桓穆二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間，對於這批出身北地的漢人豪族頗為倚重。衛瓘為河東安邑人，漢明帝時期（57—75在位）其高祖衛觚「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其子孫遂遷居此地。^⑪ 可知衛瓘與衛操同出自代郡，到了西晉仍維持宗族之間相互協力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代郡衛氏以書學傳家。《晉書》中將衛瓘與張芝並舉：「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又稱「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⑫ 可知拓跋鮮卑開始學習運用刻石立碑之際，代郡衛氏曾扮演中介者的角色。^⑬

晉光熙元年（306）衛操曾撰《桓帝功德頌碑》，可做為拓跋鮮卑學習碑刻的重要例證，也可見到投靠拓跋鮮卑的代郡衛氏，在北魏的書寫與圖像啟蒙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桓帝崩後衛操立墓碑於大邗城南，頌其功德。^⑭ 此碑在皇興（467—471）初年重新被掘出。^⑮ 《魏書》中所錄的碑文內容中記有：「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沒有餘靈。長存不朽，延于億齡。」^⑯ 刊石與圖像的功能在於紀功與存形，將刻石立碑、製作圖像與祭祀桓帝結合為一體，祈願其神靈不朽。西晉承曹魏禁喪葬立碑，但

⑩ 《魏書》，卷23〈衛操傳〉，頁599。

⑪ 《晉書》，卷36〈衛瓘傳〉，頁1055。

⑫ 《晉書》，卷36〈衛瓘傳〉，頁1057。衛瓘的傳稱書法〈頓州帖〉可見於《淳化閣帖》。森野繁夫、佐藤利行編著，《淳化閣帖法帖篇》（東京：白帝社，1988），108-109。

⑬ 殷憲，〈代郡衛氏書事活動及其意義〉，《文藝研究》，2010年2期，頁133-136。

⑭ 《魏書》，卷23〈衛操傳〉，頁599。

⑮ 《魏書》，卷23〈衛操傳〉，頁602。

⑯ 《魏書》，卷23〈衛操傳〉，頁601。

衛操為了進行外交，積極以撰書刻石來介入拓跋鮮卑的政治活動。^⑪

當西晉施行禁碑政策的同時，以代郡衛氏為首的一批漢人豪族投奔拓跋鮮卑，將立碑頌德的作法傳至代北，並作為與拓跋鮮卑合作與擁戴晉室的政治工具。相較於慕容鮮卑，拓跋鮮卑在建國之前更為積極運用立碑刻石來鞏固皇權，這一特點並延續至定都平城之後。可以說「刊石紀功」這一手段與北魏建國的歷程同時並進。

3. 馮太后的遺令與佛教信仰

文成帝時期之後隨著佛法的復興，北魏皇室的喪葬活動中進一步加入佛教供養的宗教因素，為五世紀下半北魏墓葬文化的新發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為文明太后馮氏（442—490）的喪葬禮儀。太和十四年（490）馮太后卒，據孝文帝詔書所見，馮太后的遺令「從儉」：

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纓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⑫

「纓茵」同纓繒，指無紋飾的絲織品。其中「素帳」是否與墓中奠祭有關，尚難斷定。文中陳述尚儉之德，雖未明言薄葬，似乎與北魏建國以來的厚葬趨勢相矛盾，但實際情況較為複雜。

馮太后首度將陵寢制度與佛教建築相結合，其陵廟建築群的規模宏大，除了地下的「幽房」（壽陵、永固陵）之外，尚有做為寢廟的永固堂以及思遠佛

⑪ 《猗盧之碑》殘石拓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為代王時期僅存的拓跋鮮卑石刻，相關討論參見田餘慶，〈關於“猗盧之碑”殘石拓片〉，氏著，《拓跋史探 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252-264。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1分（2012），頁1-95。

⑫ 《魏書》，卷13〈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頁330。

寺、齋堂。思遠佛寺建於太和三年（479）八月，永固陵與永固堂均始建於太和五年（481）四月，完成於太和八年（484）。^{①⑨} 其營造的先後順序是先建造佛寺再修築永固堂。永固堂為馮太后生前所完成，雕飾富麗，表現出馮太后的裝飾品味。^{②⑩} 由此可知馮太后修築思遠佛寺、齋堂並增飾永固堂，同時簡化地下墓室的規模與隨葬品，既擴大了對於死後世界的想像，也轉移了關心之所在。薦亡功德成為儒家喪禮之外的必要活動，思遠佛寺可視為唐宋功德墳寺之先聲。^{②⑪}

關於馮太后遺令從儉的原因，至少可以由以下三個角度來理解：第一、簡素為馮太后所標榜的婦德。^{②②} 第二、其先祖曾遺命薄葬，薄葬可能是其祖訓。馮太后為北燕君主馮弘（在位430—436）之孫，馮弘為北燕馮跋弟。關於馮跋的薄葬遺令已見於前引文。第三、馮太后的佛教信仰。最後一點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從佛教信仰的角度來看，靈魂所歸之處在於佛國彼岸，藉由薦亡功德才能使亡靈早日超升。孝文帝曾另在鄴城造安養寺：

魏高祖孝文皇帝……以太后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聲。仍於鄴都造安養寺，碩德高僧四方雲集，六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其精進誦經者並度出家。事無大小務於賙給。^{②③}

「年三月六」指三長齋月與六齋日，可知佛教功德成為與儒家祭典相平行的另

①⑨ 《魏書》，卷7〈高祖紀〉，頁147、150。《魏書》，卷13〈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頁329。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頁29-33。

②⑩ 林聖智，〈北魏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銅壺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33卷第1期（2015），頁169-210。

②⑪ 塚本善隆，〈曇曜沙門統時代の朝廷の崇佛〉，收入氏著《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東京：弘文堂，1944），頁131-164。

②② 《魏書》，卷13〈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頁329）。

②③ （唐）法琳《辯正論》卷三，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頁507a。

一套祭祀活動，到了唐代進而演變成制度化的國忌行香。^⑫

此外，在前引孝文帝詔書中可見有意調和佛教信仰與厚葬觀。文中最後以「梓宮」、「玄堂」作為「聖靈所憑」的陳述，肯定了葬具與墓室作為靈魂居所的功能。^⑬這種以厚葬為基調的生死觀從北魏建國以來逐步發展而成，到了馮太后專政的階段進一步將之與佛教信仰結合。相信靈魂以墓室為地下居所，但同時企盼上升佛國天界，以得到宗教性的解脫為最終依歸，表現出墓葬與佛教的分工與融通。除了喪葬禮儀之外，祈求亡者冥福的追善供養亦成為有益於死者的可行方式。這種生死觀既建立了墓葬傳統與佛教莊嚴、寺院的連結，也區隔出這兩個範疇，並為其間的關係加以定位，為北魏之後墓葬圖像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五、代人集團的圖像觀

本節嘗試由學習觀看圖像的角度來探求北魏圖像製作的開端，並重探平城時期墓葬中出現正面墓主圖像的歷史意義。正如同人類社會中的任何人群，對於拓跋鮮卑而言圖像的運用並非理所當然。觀看就如同其他文化活動，需要經過複雜的學習與文化調適過程，始能認識其效用並進而加以運用。

為了認識北魏對於墓葬圖像的認識與運用，有必要由「圖像觀」的層次來討論。所謂圖像觀意指特定人群面對圖像時所體現的文化態度（cultural attitude），屬於社會文化史而非畫論、圖像學、思想史的範疇。圖像觀為社會行為的產物，其形成機制受到視覺媒介的制約，並非以個人為限，而是具有鮮

⑫ 那波利貞，〈唐代における國忌行香に就いて〉，《史窗》，第8號（1955），頁1-17。收入氏著，《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4），頁33-48。高橋佳典，〈國忌法會を通じて見た唐代の佛教政策〉，收入福井文雅博士古稀・退職記念論集刊行會，《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儀礼》，頁629-645。

⑬ 曾布川寬指出北魏墓葬體現靈魂居於地下，生死相連續的生死觀。曾布川寬，〈中國出土のソグド石刻畫像試論〉，收入氏編，《中國美術の圖像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6），頁97-182。又見曾布川寬、吉田豐編，《ソグドの美術と言語》（京都：臨川書店，2011），頁216-317。

明的階層性，為特定社會政治群體所共享。圖像觀的塑造正如同其他社會行為，在當時未必具有清楚的意識或系統化陳述，然而卻已內化於其社會文化之中，研究者可藉由當時對於各類型圖像的運用方式、文字描述、反應等方面來加以推敲。^{②⑥}

本節以代人集團作為討論北魏圖像觀的人群範圍。^{②⑦} 在代人集團圖像觀的發展過程中，以神獸崇拜與偶像崇拜最值得注意。學界對於前者著墨不少，關於後者的討論則較為有限，本節以此為考察對象。當拓跋鮮卑移居匈奴故地之後，經由不同的文化資源認識圖像的威力並習得偶像崇拜，除了漢晉傳統以及十六國時期胡族政權對於圖像的運用方式之外，佛教圖像觀尤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藉由圖像觀的分析視角，有助於了解拓跋鮮卑如何學習觀看／運用圖像的歷史過程。

(一) 北魏的「圖像」

首先檢視「圖像」一詞的用法與意義的轉變。在兩漢魏晉對於圖像一詞的用法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將圖像中的「圖」作為動詞使用，意為「圖畫形象」。這是漢代以來對於圖像一詞的主要用法。例如《後漢書》卷八十四〈孝女叔先雄〉：「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②⑧} 其中「圖象」與「圖像」相通。這種用法也可見於前引衛操《桓帝功德頌碑》：「刊石紀功，圖像存形。」刊石與圖像互相對應。

②⑥ 欲了解拓跋鮮卑的圖像觀，最可靠的方法為依據鮮卑語來釐清其使用何種語彙來描述、認知圖像。然而鮮卑雖有語言，未知是否有鮮卑文，其《國語孝經》等著錄很可能是以漢字譯寫鮮卑語音而成。相關問題參見何德章，〈「鮮卑文字」說辨正〉，《北朝研究》，1992年2期，頁15-18。川本芳昭，〈鮮卑の文字について—漢唐間における中華意識の叢生と関連して—〉，收入氏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國家》（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63-76。

②⑦ 關於代人集團的討論參見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香出版社，1995），頁35-109。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學文學院文學研究科，2007）。

②⑧ 《後漢書》卷84〈孝女叔先雄傳〉，頁2800。

第二、將圖像一詞作為名詞，為圖畫之意，近似「形象」、「畫象」、「畫像」，相對於典籍文字。^⑫ 例如曹植〈敘愁賦〉：「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⑬ 文中「六列」與「圖像」相對，也是典籍與視覺形象之間的對比。六列指《列女傳》中的六篇，分別是〈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英皇」指舜的妃后娥皇與女英。可知其中的「圖像」指《列女圖》，為圖畫的同義語。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佛教盛行，在北魏「圖像」一詞被賦予新的佛教意涵。據《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⑭

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在位409—423）依循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在位386—409）對於佛教的態度。此處「圖像」意指塔像，即佛圖（佛塔）與佛像。^⑮ 可知此「像」除了形象（image）之外，又兼具聖像（icon）的意義。北魏昌黎王馮熙為馮太后之兄，曾造華麗的五層浮圖，據酈道元《水經注》卷十三〈灤水〉：「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⑯ 此「神圖像」指佛塔上的佛教諸神，這種圖像的用法近於「靈像」。例如〈釋老志〉：「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⑰ 其中將佛塔與佛像區分開來。又如延興二年（472）的詔書有：「濟州東平郡，

⑫ 關於漢代畫像中「畫像」一詞的用法，參見楊愛國，《幽明兩界：紀年漢代畫像石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1-2。

⑬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35（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620。

⑭ 《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0。

⑮ （北齊）魏收；塚本善隆譯注，《魏書釋老志》（東京：平凡社，1990），頁174。

⑯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13。

⑰ 《魏書》卷114〈釋老志〉，頁2913。關於北朝佛教石刻中關於佛像的描述用語，參見倉本尚德，〈北朝邑義造像銘の概要と感應思想〉，收入氏著《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法藏館，2016），頁68-69。

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⑬ 此處佛像放光，成為神靈感應之徵。

由於圖像可兼指佛教造像，在佛教的語境中多採「圖像」而非「圖象」。由此可知，北魏為圖像一詞意義擴展的重要階段，在漢代以來既有的用法之外又加上「佛圖形像」的新義，由世俗形象擴及宗教聖像，強化了偶像崇拜的意涵。

(二) 偶像崇拜與占卜

由現存的考古材料來看，拓跋鮮卑定都平城之前的飾物以各類動物、神獸所組成的金飾牌為主體，欠缺製作人像的工藝傳統。^⑭ 鮮卑的祭祀型態與匈奴相近，因此後者的習俗可作為參考。據學者研究，匈奴主要以林木、樹枝來祭祀界神靈，可能有偶像崇拜，然較為罕見。^⑮ 鮮卑的狀況同樣可做如是觀，樹木在其祭祀或傳說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顏師古（581—645）在註《漢書》〈匈奴傳〉中的「蹕林」一詞時引鮮卑習俗為證：

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⑯

其中的林木指自然的樹木或是由人工所堆積的樹枝，騎馬環繞林木為降神、通靈之手段。^⑰ 北魏建國之後，繞林而祭被加以複雜化，開始採用木人做為祭祀對象。據《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

^⑬ 《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8。

^⑭ 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頁39-40。

^⑮ 白鳥庫吉，〈匈奴の休屠王の領域と其の祭天の金人とに就いて〉，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第5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303-362。江上波夫，《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3 匈奴の社會と文化》，頁274-310。

^⑯ 《漢書》卷94〈匈奴傳〉，頁3752。

^⑰ 至孝文帝拓跋宏於西郊祭天時仍保有此俗。《南齊書》卷57〈魏虜傳〉：「宏與偽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頁991）

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為樂。^⑭

文中對於壇上木人的描述具體，計有四十九尊，高約一丈，頭戴白幘，著絹布之裙。「馬尾被」可能是指類似馬尾或是以馬尾所製的髮飾。此木人不僅是觀念上的人像，並且穿著衣物、戴髮飾，有意模擬生人。殺牲祭祀與馳馬繞壇均是以壇上的木人為視覺中心。

類似的偶像崇拜現象已可見於十六國時期。前秦苻登（在位386—394）為苻堅（在位357—385）之孫，為鼓舞士氣與後秦姚萇（384—393）對抗，立苻堅神主於軍營中，並盛飾羽葆、儀衛，「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啟主而後行。」，以祈求神靈保佑。^⑮文中並未明言神主的具體形式。由於苻登屢戰皆捷，姚萇遂在軍中立苻堅神像，以相抗衡，據《晉書》〈載記〉：「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⑯神主原來一般是指木製牌位，但姚萇所立的神主卻是人像，引來軍中的恐慌，最後甚至將人像斬首，送回苻登以求平安。對於不擅文字的胡族將士而言，這種以人像來取代木主的做法，無論在視覺上或心理上均更能產生畏怖的效果。由此可見姚萇有意操作人像的威力。

人像不僅能作為祭祀的對象，其本身所發生的變化亦能預示吉凶。據《晉書》〈載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余，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⑰十六國時期匈奴別種之羯族冉閔鑄金人占卜天命。^⑱拓跋鮮卑也以

⑭ 《南齊書》卷57〈魏虜傳〉，頁985。又據《魏書》卷108〈禮志〉：「天賜二年（405）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頁2736）。文中稱木主而非木人，推測出自魏收的文飾，《南齊書》所載較為可信。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頁167-169。

⑮ 《晉書》卷115〈載記·苻登〉，頁2948-2949。

⑯ 《晉書》卷115〈載記·苻登〉，頁2951。

⑰ 《晉書》卷106〈載記·石季龍〉，頁2773。同事又見於《晉書》卷95〈藝術·佛圖澄〉，頁2490。

⑱ 《晉書》卷110〈載記·慕容儁〉：「又聞閔鑄金為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頁2832）。

鑄金人來占卜吉凶，該習俗亦可見於匈奴，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習俗。^⑭ 北魏建國之初沿襲鑄造金人占卜之俗。據《魏書》卷12〈皇后列傳〉：「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⑮ 皇始二年（397）年十月道武帝攻克中山（今河北定縣）之後，道武帝欲納後燕慕容寶女為后，慕容氏順利鑄成金人，遂被立為后。^⑯ 此外，明元帝夫人姚氏（後秦姚興之女）因「鑄金人不成」，遂未能被立后。^⑰

這種鑄像占卜之俗延續至洛陽時期。大都督爾朱榮（493—530）領兵進洛陽發動河陰之變之前，曾密議立新主，人選懸而未決，於是鑄像占卜。據《魏書》卷七十四〈爾朱榮傳〉：「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⑱ 鑄造六像，僅長樂王元子攸（孝莊帝，在位528—530）順利完成。相對於前引文中后妃必須親自鑄像，此處則是單由鑄像的結果來評估。文中並未描述鑄像本身，不過在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中有生動的記載：

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壁。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⑲

「光相具足，端嚴特妙」原為稱頌佛像相好的用語，楊銜之轉用來形容金人所

⑭ 鑄像占卜之風廣見於北亞草原的匈奴、契丹、蒙古。船木勝馬，《古代遊牧騎馬民の國—草原から中原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9），頁218-219。江上波夫，《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3 匈奴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291-310。

⑮ 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頁321。James R. Ware, "An Ordeal Among the T'o-pa Wei," *To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2, Livr. 4 (1936), pp. 205-209.

⑯ 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頁325。

⑰ 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頁325。

⑱ 魏收，《魏書》，卷74〈爾朱榮傳〉，頁1647。（唐）李延壽，《北史》，卷48〈爾朱榮〉（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753、1777。

⑲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6。

現的人君之像。^⑮ 爾朱榮是否曾以觀看佛像的態度來看待占鑄像，目前已無法證明，但可以確定的是鑄像與佛像具有共通之處，亦即均能預示吉凶，顯現靈驗。在佛教文化普及的狀況下，當時人們對於「人像」的理解方式，無論是在觀念上或語言上，很可能均受到佛教不同程度的影響。^⑯ 鑄像占卜的習俗顯示出匈奴、鮮卑對於人像的特殊信仰，與佛教造像的發展可能具有內在的聯繫。^⑰

（三）佛教造像的感應與功德

關於代人集團對於佛教圖像的認識，首先可以由造像題記著手，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宕昌公暉福寺碑》（圖33，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具有代表性。宦官鉗耳慶時（王遇）為馮翊郡（今陝西高陵縣）之羌族，立碑之際任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吏部尚書，正處於其政治生涯的高峰。善於營造，深受馮太后寵信，前述文明太后陵廟即為其所監作。^⑱ 鉗耳慶時在其鄉里澄城（今陝西澄城縣）為並稱「二聖」的馮太后與孝文帝建暉福寺，並各立三重塔一區。

此碑額篆書為：「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稱「大代」而不稱「大魏」。^⑲ 又碑文中有：「於顯大代，長發其祥。景運承苻，世有詰王。」均顯示出鉗耳慶時的代人意識。^⑳ 碑文中將塔寺描述為：「金儀赫曜，彩綢光備。觀之者

^⑮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其上有佛結跏趺坐，放大光明。爾時妙莊嚴王作是念：佛身希有，端嚴殊特，成就第一微妙之色。」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九冊，頁60b。

^⑯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崔浩、魏收均將西漢匈奴休屠王所立的金人視為佛像。白鳥庫吉，〈匈奴の休屠王の領域と其の祭天の金人とに就いて〉，頁325-326。（北齊）魏收；塚本善隆譯注，《魏書釋老志》，頁94-95。

^⑰ 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の研究》（東京：ブリュッケ，2005），頁34-35。

^⑱ 《魏書》卷94〈王遇傳〉，頁2023-2024。曾布川寬，〈雲岡石窟再考〉，頁71。

^⑲ 以下釋文引自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3。

^⑳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頁111-158。

則澄發道心，藻除塵垢；悒玄者則陶真煉和，遺形忘返。」強調對於觀者／信徒的宗教感化力。題記中的「體非名相，圖像以之而應」則表現出佛教的感應觀，亦即真理無形，信徒只能透過對於造像的感應來加以理解。這種感應觀與北朝造像碑中所見對於佛像的認識相同。^⑮ 在這種以造像的中介為前提的佛教感應觀中，造像反過來制約了禮拜的應有樣態，信徒與造像之間的感應成為宗教活動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提升了形像在其政治社會中的地位。

另外就北魏造像的發展史來看，道武帝時期已展開佛教造像活動。^⑯ 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太武帝滅佛為中國史上的第一次滅佛，也是第一次的偶像破壞運動。在廢佛的行動中，佛寺、佛像為重要標的。太子拓跋晃屢次上表認為即使廢佛法也並沒有必要毀棄佛寺、佛像：

頻上表，陳刑殺沙門，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⑰

然而太武帝下詔嚴加禁制：「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⑱ 從圖像觀的角度來看，廢佛之舉也可視為拓跋鮮卑對於偶像崇拜之風的反動。

興安元年（452）文成帝下詔回復佛法，北魏對於偶像的崇拜進入另一個階段。

⑮ 佐藤智水，《北魏佛教史論考》（岡山：岡山大學文學部，1998），頁77-133。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增訂本）——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258-284。倉本尚德，《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頁31-93。關於中國佛教和傳統感應論的關係，參見Robert H. Sharf,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 77-133. 中譯見羅伯特·沙夫著；夏志前、夏少偉譯，《走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75-125。李豐楙，〈感動、感應與感通、冥通：經、文創典與聖人、文人的譯寫〉，《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2期（2008），頁247-281。

⑯ 塚本善隆，〈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佛教〉，收入氏著，《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東京：弘文堂，1944），頁57-96。水野清一，〈魏書釋老志の耆闍崛山殿〉，收入氏著，《中國の佛教美術》（東京：平凡社，1968）頁336-343。

⑰ 《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4。

⑱ 《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5。

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為純誠所感。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①⑥}

此文有意營造皇帝的身體與佛像之間在型態上、特徵上的相似性。所造石像有黑石，與文成帝身體的特徵相符，並作為佛陀對於文成帝虔信的感應。文成帝又於興光元年（454）為太祖以下五帝造五軀釋迦立像。五帝分別指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恭宗景穆帝、（今上）文成帝。^{①⑦}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一期的第十六至二十窟（曇曜五窟）的巨佛造像，可做為五世紀下半宗教偶像崇拜的紀念碑。北魏佛教信仰的特色之一為佛法與皇帝崇拜之間的關聯性。這種將歷代帝王比擬為釋迦佛的做法，可以在佛教法身與應化身的觀念中找到理論依據。^{①⑧} 這不但顯示出北魏皇權與佛法之間的緊密聯繫，還意味著佛教信仰有助於代人集團學習較為複雜的觀看邏輯，亦即區別出本體（法身）與化現（應化身）之間的對應與差異。

另以雲岡石窟第二期的第九、十窟為例（圖34），^{①⑨} 除了偶像崇拜之外，就形式而言其布局以下特點：第一、由前後室所構成；第二、強調入口的象徵

①⑥ 《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6。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の研究》，頁82。

①⑦ 塚本善隆，〈雲岡三則〉，收入氏著《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頁215-233。

①⑧ 《魏書》卷114〈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頁3027-3028）塚本善隆譯注，《魏書釋老志》，頁136-137。佐藤智水，〈雲岡佛教の性格—北魏國家佛教成立の一考察〉，《東洋學報》，第59卷第1、2號（1977），頁27-66，收入氏著，《北魏佛教史論考》，頁134-172。曾布川寬，〈雲岡石窟再考〉，《東方學報》，第83冊（2008），頁1-155，特別是頁135注21。

①⑨ 此雙窟年代可改定為太和五年（481）之前。參見曾布川寬，〈雲岡石窟再考〉，頁67-76。

性；第三、嚴整的左右對稱性；第四、以各類雕像、裝飾布滿壁面。^{①65} 這種布局將信徒包覆在兼具分層、對稱與繁複裝飾性的宗教空間之中，並由外而內，逐次將觀者導向後室中央的主尊。當時寺院內部的裝飾或可由這類石窟來推想。

(四) 北魏的正面墓主圖像

經過以上的探討，可對於北魏墓葬中的正面墓主圖像得到新的認識。^{①66} 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山西大同沙嶺壁畫墓為目前所知最早的北魏紀年壁畫墓，其中正面墓主夫婦圖像分別位在墓室頂端（東壁中央）與漆棺前檔（圖35、36）。^{①67} 這種以正面墓主夫婦畫像為中心的布局反覆出現在平城時期的屋型葬具、壁畫墓並延續至北朝晚期，成為北魏墓葬圖像中最具典型意義的配置方式，已為學界所熟悉。^{①68}

①65 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曾考察雙室石窟與雙室墓之間的可能關係。Nancy S. Steinhardt, “From Koguryōto Gansu and Xinjiang: Funerary and Worship Space in North Asia 4th-7th centuries”, 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153-203。上述第三、四項特點可見於做為雲岡石窟源流的河西石窟，例如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54窟。Stanley K. Abe, “Art and Practice in A Fif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Cave Temple,” *Ars Orientalis*, vol. 20 (1990), pp. 1-31.

①66 鄭岩曾討論墓主圖像與宗教偶像的相關性，參見氏著，《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頁181-186。

①67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115-12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10期，頁4-24。徐潤慶，〈從沙嶺壁畫墓看北魏平城時期的喪葬美術〉，收入巫鴻、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一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163-190。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1-95。

①68 最近倪潤安認為北魏中期壁畫墓中的墓主圖像趨向消失。然而由於出土材料有限，目前似尚難斷定。倪潤安，〈北朝墓主人圖像的顯與隱〉，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編，《兩個世界的徘徊：中古時期喪葬觀念風俗與禮儀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250-281。

如前述，魏晉時期的墓主夫婦畫像具有正面像與側身／對坐像兩種形式。^{①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知北魏平城時期的壁畫墓、石槨中的墓主圖像均採用正面像的形式，例如新發表的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M9壁畫墓。^{①⑦}此墓為長斜坡墓道磚構單室墓，坐北朝南，墓主圖像位在北壁中央，朝向墓門（圖37、38）。墓主坐於牀上，下方有一曲足案，案上置圓形紅色食器，周圍並陳設壺、罐等器物。由此可知代人集團對於墓主圖像的類型有特定的選擇，偏好採用正面像。這類正面墓主圖像在墓室空間中所具有的喪葬功能值得進一步探究。

沙嶺壁畫墓與全家灣M9壁畫墓的特點在於將墓主圖像安置在墓葬中軸線的頂端，成為主導全局的視覺焦點。這種結合正面像與中軸空間布局的配置所形成的觀看方式，可稱之為「中軸視線」。這種觀看方式將正面像與空間一體化，既表現出墓主觀看喪家，也預設了喪家於墓中設奠時的視線。圖中所繪的曲足案、食器、侍者奉食等可視為祭奠場面的視覺化。^{①⑧}可知北魏的墓主圖像除了做為死者生活於地下世界的表象之外，還兼具做為祭奠對象的功能，強調墓主形像的永恆性。這兩種象徵性相輔相成，共同塑造出死者居於地下世界的理想化形像，正呼應了沙嶺壁畫墓的柩銘中所記的「慈顏之永住」。^{①⑨}

魏晉時期的薄葬促使墓內設奠的流行，成為正面墓主圖像發展的新契機。到了北魏將墓內設奠與厚葬相結合，由祭奠的視覺中心進而演變成壁畫布局的中心，造成正面墓主圖像新一波的發展。隨著佛教的盛行，全面提升正面形像

①⑥ 霍承嗣壁畫墓、朝陽袁臺子壁畫、遼陽上王家村壁畫墓、石景山八角村石龕屬前者；酒泉丁家閘五號墓、遼陽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壁畫墓、遼陽棒臺子屯壁畫墓則為後者。

①⑦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北魏墓（M7、M9）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12期，頁4-21。另有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槨、大同雲波里路北魏壁畫墓等。王銀田、劉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文物》，2001年7期，頁40-5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雲波里路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12期，頁13-25。

①⑧ 沙嶺壁畫墓中出土銅帳鉤，推測是墓中設奠的遺存。另外該墓出土刻有「奠人」的漆耳杯，應為相關陳設。李梅田，〈平城地區北魏墓葬研究〉，頁176。林聖智，〈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頁33。

①⑨ 趙瑞民、劉俊喜，〈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出土漆皮文字考〉，《文物》，2006年10期，頁78-81。

的神聖性，亦有助於塑造出代人集團重視偶像崇拜的圖像觀。這些今日看來模式化的墓主圖像，在當時均已被加以「個人化」。其中一個重要方式為書寫包含墓主名諱、官銜的題記。^{①⑦} 對喪家而言，只要能誠心禮拜，即可賦予足以表象／替代墓主靈魂的神力，具有不可思議的「真實感」。對代人集團而言，以正面像來表現墓主可能是引發神靈感應並感受真實感的有效方式。要留意的是在此所謂的真實感是鑲嵌在平城時期的政治社會文化脈絡之中，由代人集團的圖像觀所建構而成。

最後以一則史料做為代人集團圖像觀的註腳。高宗文成帝時期高允由儒家禮教的角度批評代人喪禮的亂象：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①⑧}

「尸」為儒家祭祀中用來替代已故先人受祭的對象。然而代人卻追求尸與亡者的容貌相類，由偶像崇拜的角度來看待尸，並試圖建立尸與亡者在視覺形象上的形似。這與前引後秦姚萇在軍中立苻堅像一事具有共通之處，兩者均企圖在祭祀對象上追求更近於人像或生人的真實感，可知對於人像容貌真實感的意識是代人圖像觀的內涵之一。這類違反儒家禮制的作法，頗能顯示出當時偶像崇拜的風潮與圖像觀的新發展。

小結

魏晉時期的墓葬圖像繼承了漢代壁畫墓的主題與風格，其中部分墓主圖像發揮了新的儀式性功能。由朝陽袁臺子壁畫墓、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北京石景山八角村墓可看出，魏晉時期的部分墓壁畫題材與墓奠密切相關，具備了以

^{①⑦} Dietrich Seckel, "The Rise of Portraiture in Chinese Art," *Artibus Asiae*, vol. 53, no. 1/2 (1993), pp. 7-26.

^{①⑧} 《魏書》卷48〈高允傳〉，頁1074-1075。

下兩項共通的要素：藉由墓主圖像或空帳來界定受祭對象，以及陳設祭奠。這兩項要素構成了墓室內祭奠空間。石景山墓石龕與袁台子墓中均將正面墓主圖像作為祭奠對象。這一趨勢雖然在東漢已經出現，但是直到魏晉才將祭器、帷帳、正面墓主像結合成一完整的祭奠單元，是墓主圖像在喪葬功能上的一大變革。這種成為祭祀單元的正面墓主圖像首次出現在盛行薄葬的魏晉，可見葬俗與圖像之間的複雜關係。

魏晉薄葬論的基本論點繼承自東漢，其特點在於具體加以實踐、規範化，並重視喪禮中的靈牀、墓中的靈座、牀榻等器具的象徵意義。成為祭祀單元的正面墓主圖像，或可視為派生自此時代趨勢的地域性發展。靈座等器具之所以不可或缺，在於這才是神魂憑依之處。薄葬論的流行、單室墓的確立、墓內設奠等現象均與此事互為表裡，凸顯出重神棄形的生死觀。其生死觀中以「憑依」的概念替代「居住」，從而建立神魂與墓室的新關係。可能也只有建構這種神魂與墓室的新關係，才能真正消解死者未能擁有地下居所的焦慮。魏晉墓葬文化的變遷包含對於何為墓葬的根本認識的改變，並非僅是在形式上將東漢墓葬傳統化繁為簡而已。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漢代以來死者靈魂居於墓室的觀念也同時傳承下來。由墓葬形制、壁畫主題與隨葬品來看，上述袁臺子壁畫墓等三例均具有作為死者地下居室與表象小宇宙的意義。在墓內舉行設奠讓靈魂憑依的同時，墓室仍然被視為靈魂的居所。由此看來，霍承嗣壁畫墨書題記中「余魂來歸墓」所傳達企求靈魂回歸墓葬的願望，仍具有普遍的意義。這雖然與魏文帝「冢非棲神之宅」的主張形成強烈對比，但卻接近當時大多數人們的死後願望。墓室作為地下居室與靈魂所歸之處的觀念，依然深植人心。

平城時期代人集團重新匯聚西晉、十六國時期以來的喪葬習俗，為了重建政治秩序、收編不同的部落、民族，厚葬重新開始流行，逐步強化墓室作為地下居室的象徵性，將墓室視為神靈所居之處。對於原來相信魂歸赤山的拓跋鮮卑而言，這無疑是其生死觀的一大轉變。在此同時，墓內設奠的葬俗也流傳至平城地區，並進一步與其他各類的墓中設施產生連結，在形制簡單的墓室中建構出複合性的喪葬空間。

隨著北魏國家制度的創建，遼東、河西等各地的人力物力不斷集中到平城，北魏明元帝至文成帝的時期（409—465），以拓跋鮮卑為首的代人集團逐

漸發展出綜合漢晉制度與鮮卑故俗的新型墓葬文化。為了與漢代厚葬相區別，本文稱之為「平城型厚葬」，其特徵包括：（一）、重視會喪人數的規模，並在喪禮中大量焚燒死者遺物；（二）、恢復寢廟，建立墓碑；（三）、沿襲墓中設奠的陳設；（四）、葬具被賦予新的象徵性；（五）、墓葬與佛教相互分工，造塔設像成為喪葬活動的一環；（六）、圖像運用與厚葬相結合。

代人集團的圖像觀中包含多重源流，其中的佛教因素擴充了圖像一詞的宗教意涵，由世俗形象擴及宗教聖像，強化了偶像崇拜的性格。圖像以新的形態被導入墓葬的範疇，觀者也以新的心態來面對圖像的世界。以上對於代人集團圖像觀的探討並不充分，然藉由圖像觀的視角，本文嘗試闡述以下觀點：觀者的文化態度與聯想是任何類型的觀看的必要基礎，墓葬圖像也不例外。墓葬圖像的變遷並非侷限於墓葬文化內部，而是與特定歷史脈絡中所發展出來的觀看方式習習相關。尋求脈絡化的觀看之道，可能有助於認識墓葬圖像的內涵。

後記：承蒙兩位審查先生悉心指正，受益良多，深表謝忱。

（責任編輯：陳卉秀）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唐) 李延壽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 杜佑

《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梁) 沈約

《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唐) 房玄齡等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

(唐) 法琳

《辯正論》，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范祥雍

《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宋) 范曄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清) 孫希旦

《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孫詒讓

《周禮正義》，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

(晉) 陳壽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8。

陳橋驛著

《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

《石刻史料新編 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

(姚秦) 鳩摩羅什譯

《妙法蓮華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九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趙萬里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第三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唐)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

《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東漢) 鄭玄注、(唐) 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 3 周禮》，臺北：商務印書館，2001。
- (東漢) 鄭玄注、(唐) 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 5 禮記》，臺北：商務印書館，2001。
- (梁) 蕭統編；(唐) 李善注
《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北齊) 魏收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北齊) 魏收；塚本善隆譯注
《魏書釋老志》，東京：平凡社，1990。
- (北魏)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
《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近人論著

- 丁愛博 (Albert E. Dien) 著、李梅田譯
2013 《六朝文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Dien, Albert E.; Li, Mei-tian, trans.
2013 *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1978 〈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7期，頁29-33。
Datong Museum, and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ultural Relics
1978 “Datong fangshan beiwei yongguling (Northern Wei Yonggu Mausoleum at Fangshan in Datong),” *Cultural Relics*, vol. 7, pp. 29-33.
-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2006 〈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0期，頁4-24。
2011 〈山西大同雲波里路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2期，頁13-25。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Datong City
2006 “A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Mural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located in Shaling, Dat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vol. 10, pp. 4-24.
2011 “A Mural-Painted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in Yunboli Road, Datong, Shanxi,” *Cultural Relics*, vol. 12, pp. 13-25.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2015 〈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北魏墓 (M7、M9) 發掘簡報〉，《文物》，12期，頁4-21。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the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Datong City
2015 “Shanxi datong nanjiao tongjiawan beiwei mu (M7, M9) fajue jianbao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Northern Wei Tombs M7 and M9 at Tongjiawan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Datong, Shanxi),” *Cultural Relics*, vol. 12, pp. 4-21.

上村幸次

1936 〈三國時代喪葬禮俗私考〉，《大谷學報》，17卷2號，頁137-148。

Uemura, Kōji

1936 “Sangokujidai sōsō reizoku shikō (Personal Thoughts on the Burial Rituals and Custom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Otani Gakuho: The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Humanities*, vol. 17, no. 2, pp. 137-148.

下中邦彥編集

1959 《書道全集 第三卷 中國3 三國・西晉・十六國》，東京：平凡社。

Shimonaka, Kunihiko, ed.

1959 *Shodō zenshū 3. Chūgoku: Sangoku, Seishin, Jūrokkoku* (Compil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alligraphy, vol. 3, China 3: Three Kingdoms, Western Jin, and Sixteen Kingdoms), Tokyo: Heibonsha.

小南一郎

1993 〈神亭壺と東吳の文化〉，《東方學報》，65冊，頁223-312。

Kominami, Ichiro

1993 “Aspect of Eastern Wu 東吳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the ‘Hunping’ 魂瓶 Spirit Bottles,”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Kyoto, vol. 65, pp. 223-312.

川本芳昭

2015 《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國家》，東京：汲古書院。

Kawamoto, Yoshiaki

2015 *Higashiajia kodai ni okeru sho minzoku to kokka* (Peoples and States in ancient East Asia), Tokyo: Kyūko shoin.

木島史雄

1990 〈招魂をめぐる禮俗と禮學〉，《中國思想史研究》，13號，頁35-62。

Kishima, Fumio

1990 “The Ritual Forkways on the Recall of the Soul and their Studies,” *Journal of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no. 13, pp. 35-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59 《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CASS

1959 *Luoyang shaogou hanmu* (Han Tombs at Shaogou in Luoy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王儒林

1964 〈河南南陽西關一座古墓中的漢畫像石〉，《考古》，8期，頁424-426。

Wang, Ru-lin

- 1964 “Henan nanyang xiguan yizuo gumu zhong de han huaxiangshi (Han Pictorial Stones in an Ancient Tomb at Xiguan in N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Archaeology*, vol. 8, pp. 424-426.

王銀田、劉俊喜

- 2001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文物》，7期，頁40-51。

Wang, Yin-tian, and Jun-xi Liu

- 2001 “Excavation of a Northern Wei Tomb with a Painted Stone Coffin Chamber,” *Cultural Relics*, vol. 7, pp. 40-51.

水野清一

- 1968 《中國の佛教美術》，東京：平凡社。

Mizuno, Seiichi

- 1968 *Chūgoku no bukkyō bijutsu* (Buddhist Art in China), Tokyo: Heibonsha.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 1951 《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第六冊，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Mizuno, Shiichi and Toshio Nagahiro

- 1951 *Yun-Kang: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of the Fifth Century A.D. in Northern China*, vol. 6,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白鳥庫吉

- 1970 《白鳥庫吉全集》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

Shiratori, Kurakichi

- 1970 *Shiratori kurakichi zenshū*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Writings of Shiratori Kurakichi), vol. 5, Tokyo: Iwanami shoten.

中村圭爾

- 1993 〈江南六朝墓出土陶瓷の一考察〉，收入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83-135。
- 2006 《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Nakamura, Keiji

- 1993 “Kōnan rikuchō haka shutsudo tōji no ichikōsatsu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mbs in Jiangnan),” in Mamoru Tonami, ed., *Chūgoku chūsei no bunbutsu* (Cultural Relics in Medieval China),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pp. 83-135.
- 2006 *Rikuchō Kōnan chiikishi kenkyū* (Regional History of Jiangnan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okyo: Kyūko shoin.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

- 1965 〈北京西郊王浚妻華芳墓清理簡報〉，《文物》，12期，頁21-24。

Beijing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 1965 “Beijing xijiao Wang Jun qi Hua Fang mu qingli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Wang Jun’s Wife, Hua Fang,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vol. 12, pp. 21-24.

甘肅省文物隊等

- 1985 《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Gansu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Team, et al.

- 1985 *Excavation of the Tomb with Wall Painting at Jiayugu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甘肅省考古研究所編

- 1989 《酒泉十六國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

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ed.

- 1989 *Wall Paintings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Tomb at Jiuqu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1998 《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1998 *Pictorial Brick Tombs of the Western Jin Period at Foyemiaowan, Dunhuan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石景山區文物管理所

- 2001 〈北京市石景山區八角村魏晉墓〉，《文物》，4期，頁54-59。

Shijingshan District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 2001 “Beijing shi shijingshanqu bajiaocun weijinmu (Wei-Jin Tombs in Bajiao Village,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vol. 4, pp. 54-59.

田立坤

- 2002 〈袁臺子壁畫墓的再認識〉，《文物》，9期，頁41-48。

Tian, Li-kun

- 2002 “Yuantaizi bihuamu de zairenshi (Revisiting Mural Tombs in Yuantaizi),” *Cultural Relics*, vol. 9, pp. 41-48.

田餘慶

- 2011 《拓跋史探 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Tian, Yu-qing

- 2011 *Tuoba shitan xiudingben*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Tuob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石松日奈子

- 2005 《北魏佛教造像史の研究》，東京：ブリュッケ。

Ishimatsu, Hinako

- 2005 *Buddhist Images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Tokyo: Brücke.

朱亮、李德方

- 1996 〈洛陽魏晉墓葬分期的初步研究〉，收入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陽考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78-290。

Zhu, Liang, and De-fang Li

- 1996 “Luoyang weijin muzang fenqi de chubu yanjiu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Wei-Jin Tombs in Luoyang),” in Luoyang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ed., *Forty Years of Archaeology in Luoy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278-290.

江介也

- 1994 〈江南地區六朝墓における副葬品配置—埋葬空間の機能構成—〉，《考古學と信仰》同志社大學考古學シリーズVI，頁517-538。

Koh, Yoshimata

- 1994 “Kōnan chiiki rikuchō haka ni okeru fukusōhin haichi: maisō kūkan no kinō kōsei (Arrangement of Grave Goods in Six Dynasties Tombs in Jiangnan: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Burial Space),” *Kōkogaku to shinkō* (Archaeology and Faith), Dōshishadaigaku kōkogaku shirīzu (Doshisha University Archaeology Series) VI, pp. 517-538.

吉川忠夫

- 1997 〈皇甫謐の《篤終論》〉，財團法人東方學會，《東方學界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財團法人東方學會，頁1187-1200。
- 1998 《中國人の宗教意識》，東京：創文社。

Yoshikawa, Tadao

- 1997 “The Tu-chung lun of Huang-fu Mi,” in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Eastern Studies Fiftieth Anniversary Volume*, Tokyo: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pp. 1187-1200.
- 1998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 Medieval China*, Tokyo: Sōbunsha.

江上波夫

- 1999 《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3 匈奴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

Egami, Namio

- 1999 *Egami Namio bunkashi ronshū 3: Kyōdo no shakai to bunka* (Collection of Egami Namio's Essays on Cultural History 3: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Xiongnu),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向井佑介

- 2014 〈墓中の神坐—漢魏晉南北朝の墓室内祭祀—〉，《東洋史研究》，73卷1號，頁19-21。

Mukai, Yusuke

- 2014 “The Seat of the Spirit in Tombs: Rituals in Burial Chambers from the Han to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Journal of Oriental Researches*, vol. 73, no. 1, pp. 19-21.

李文信

1955 〈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文物參考資料》，5期，頁15-42。

Li, Wen-xi

1955 “Liaoyang faxian de sanzuo bihua gumu (Three Ancient Mural Tombs Found in Liaoyang),”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s*, vol. 5, pp. 15-42.

李宗道、趙國璧

1958 〈洛陽16工區曹魏墓清理〉，《考古簡訊》，8期，頁51-53。

Li, Zong-dao, and Guo-bi Zhao

1958 “Luoyang 16 gongqu caoweimu qingli (Excavation of the Cao Wei Tomb in Work Area No. 16, Luoyang),” *Archaeology*, vol. 8, pp. 51-53.

李慶發

1959 〈遼陽上王家村晉代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7期，頁60-62。

Li, Qing-fa

1959 “Liaoyang shangwangjiacun jindai bihuamu qingli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Jin Mural Tombs at Shangwangjia Village in Liaoyang),” *Cultural Relics*, vol. 7, pp. 60-62.

河北省文管處

1979 〈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3期，頁17-31。

Hebei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1979 “Hebei jingxian beiwei gaoshimu fajue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Northern Wei Gao Family Tombs at Jingxian, Heibei),” *Cultural Relics*, vol. 3, pp. 17-31.

李俊清

1990 〈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期，頁67-74、38。

Li, Jun-qing

1990 “Beiwei jinling dili weizhi de chubu kaoch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Northern Wei Imperial Mausoleum “Jingling”),” *Wenwu Jikan* (Cultural Relics Quarterly), vol. 1, pp. 67-74, 38.

何德章

1992 〈“鮮卑文字”說辨正〉，《北朝研究》，2期，頁15-18。

He, De-zhang

1992 ““Xianbei wenzi” shuo bianzheng (Examination and Correction of the Theory of “Xianbei Characters”),” *Beichao Yanjiu* (Northern Dynasties Research), vol. 2, pp. 15-18.

李如森

1995 《漢代喪葬制度》，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Li, Ru-sen

1995 *Handai sangzang zhidu* (Funeral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李淞

2000 《論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圖像》，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Li, Song

2000 *A Study of the Images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Han Dynasty Art*,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巫鴻

1989 〈漢明、魏文的禮制改革與漢代畫像藝術之盛衰〉，《九州學刊》，3卷2期，頁31-44。

Wu, Hung

1989 “Hanming, weiwen de lizhi gaige yu handai huaxiang yishu zhi chengshuai (Ritual Reforms in the Reigns of Emperors Ming of Han and Wen of Wei,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ortrait Art in the Han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vol. 3, no. 2, pp. 31-44.

巫鴻著，鄭岩、王睿編

2005 《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上、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Wu, Hung; Zheng, Yan, and Rui Wang, eds.

2005 *Art in Its Ritual Context: Essays on Ancient Chinese Art by Wu Hung*, 2 vol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邢義田

2006 〈陝西旬邑百子村壁畫墓的墓主、時代與「天門」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3卷3期，頁1-38。

2011 《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

Hsing, I-tien

2006 “Notes on the Occupant, Date, and “Heavenly Gate” of the Painted Tomb at Pai-tzu-ts’un in Hs’n-I, Shens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3, no. 3, pp. 1-38.

2011 *Hua wei xinsheng: Huaxiangshi, huaxiangzhuan yu bihua* (Painting as a Voice of Mind: Pictorial Stones, Bricks, and Mura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余英時

1987 〈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123-143。

Yu, Ying-shih

1987 “Zhongguo gudai sihou shijieguan de yanbian (Changes in the Worldview of the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 in Yu Ying-shih, *Zhongguo sixiang chuantong de xiandai quanshi*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余英時著，侯旭東等譯

2008 《東漢生死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Yu, Ying-shih; Hou, Xu-dong, et al. trans.

2008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A.D. 25-220*,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李豐楙

2008 〈感動、感應與感通、冥通：經、文、典與聖人、文人的譯寫〉，《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2期，頁247-281。

Lee, Fong-mao

2008 “Communication, Sympathy, Communion with Invisible: Creation of Scriptures, Literary Works and Translation by the Sages and Literati,”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2, pp. 247-281.

李梅田

2010 〈曹魏薄葬考〉，《中原文物》，4期，頁17-69。

2012 〈平城地區北魏墓葬研究〉，收入《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67-178。

Li, Mei-tian

2010 “A Study of the Plain Burial of Wei State in the Reign of Cao Cao,”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4, pp. 17-69.

2012 “Pingcheng diqu beiwei muzang yanjiu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Wei Tombs in Pingcheng),” i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Xu Ping-fang xiansheng jinian wenji*, ed., *Xu Ping-fang xiansheng jinian wenji*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Memory of Xu Ping-fang),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pp. 167-178.

那波利貞

1955 〈唐代における國忌行香に就いて〉，《史窗》，8號，頁1-17。

1974 《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

Naba, Toshisada

1955 “Toudai ni okeru kokki gyokou nitsuite (Research on the Temple Prayer Service Practice on a National Memorial Day in the Tang Dynasty),” *Shisou*, no. 8, pp. 1-17.

1974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ang China*, Tokyo: Sobunsha.

谷川道雄

1963 〈初期拓跋國家における王權〉，《史林》，46卷6號，頁48-70。

1998 《增補 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

Tanigawa, Michio

1963 “Shoki Tsubusebatsu kokka ni okeru ōken (Kingship in Early Tuoba States),” *Journal of History*, vol. 46, no. 6, pp. 48-70.

1998 *Zui tō teikoku keiseishiro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ui and Tang Empires, Supplementary Version), Tokyo: Chikuma shobo.

佐藤智水

1977 〈雲岡佛教の性格—北魏國家佛教成立の一考察〉，《東洋學報》，59卷1、2號，頁27-66。

1984 〈北魏皇帝の行幸について〉,《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12卷5期,頁39-53。

1998 《北魏佛教史論考》,岡山:岡山大學文學部。

Satō, Chisui

1977 “Kumooka bukkyō no seikaku—hokugi kokuka bukkyō seiritsu no ichikōsatsu (The Character of Yungang Buddhism: Inquiry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uddhism in Northern Wei States),” *The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vol. 59, no. 1-2, pp. 27-66.

1984 “Hokugi kōtei no gyōkō nitsuite (Royal Visits of Northern Wei Emperors),”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Okayama University*, vol. 12, no. 5, pp. 39-53.

1998 *Hokugi bukkyōshi ronkō*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Northern Wei Buddhist History), Okayama: Okayama University Faculty of Letters.

吾妻重二

2005 〈木主について——朱子學まで〉,收入福井文雅博士古稀・退職記念論集刊行會,《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儀礼》,東京:春秋社,頁143-162。

Azuma, Fuji

2005 “Kinushi nitsuite—shusu gaku made (Memorial Tablets: Master Zhu’s Learning),”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ssays in Honour of Dr Fumimasa-Bunga Fukui on His Retirement and Seventieth Birthday, Philosophy and Ritual in Asian Culture: Essays in Honour of Dr Fumimasa-Bunga Fukui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Tokyo: Shunjusha Publishing Company, pp. 143-162.

吾妻重二著;吳震編;吳震、郭海良等譯

2012 《朱熹《家禮》實證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Azuma, Fuji; Wu, Zhen ed.; Wu, Zhen, and Hai-liang Guo, trans.

2012 *Zhu Xi Jiali shizhengyanjiu* (An Empirical Study on Zhu Xi’s Family Rit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村元健一

2000 〈北魏永固陵の造營〉,《古代文化》,52卷2期,頁18-28。

Muramoto, Kenichi

2000 “Hokugi ei koryō no zōei (Construction of Northern Wei Yonggu Mausoleum),” *Cultura Antiqua*, vol. 52, no. 2, pp. 18-2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1963 〈河南南陽東關晉墓〉,《考古》,1期,頁25-27。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of Henan Provincial Cultural Bureau

1963 “Henan Nanyang Dongguan jinmu (Jin Tombs at Dongguan, Nanyang, Henan),” *Archaeology*, no. 1, pp. 25-27.

南京市博物館

1972 〈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1期,頁23-41。

Nanjing Museum

- 1972 “Nanjing xiangshan 5 hao, 6 hao, 7 hao mu qingli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ombs No. 5, 6, and 7 at Xiangshan in Nanjing),”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23-41.

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

- 1973 〈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4期，頁36-50。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 1973 “Nanjing daxue beiyuan dongjin mu (An Eastern Jin Tomb on the North Campus of Nanjing University),”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36-5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 2010 《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Hene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

- 2010 *Cao Cao gaoling kaogu faxian yu yanjiu*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Research of the Gaoling Mausoleum of We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林聖智

- 2012 〈北魏沙嶺壁畫墓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本1分，頁1-95。
2015 〈北魏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銅壺談起〉，《故宮學術季刊》，33卷1期，頁169-210。

Lin, Sheng-chih

- 2012 “A Stud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Mural Tomb at Shali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83, no. 1, pp. 1-95.
2015 “The Culture of Decoration during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 Discussion Arising from a Bronze Hu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3, no. 1, pp. 169-210.

牧尾良海

- 1978 〈招魂葬考〉，《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2號，頁1-15。

Makio, Ryokai

- 1978 “On the Burials of Evoked Souls,”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Taisho University*, no. 2, pp. 1-15.

東潮

- 1997 《高句麗考古學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Azuma, Ushio

- 1997 *Kōkuri kōkogaku kenkyū*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Goguryeo), Tokyo: Yoshikawakōbunkan.

松下憲一

- 2007 《北魏胡族體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學文學院文學研究科。
2007 〈「定襄之盛樂」と「雲中之盛樂」——鮮卑拓跋國家の都城と陵墓——〉，《史朋》，40號，頁1-21。

Matsushita, Kenichi

2007 *Forma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Nomadic State*, Sapporo: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Hokkaido University.

2007 “Analyze the City of Sheng-Lo (盛樂) and Chin Tombs (金陵) in T'o-Pa (拓跋) History,” *Shihō*, no. 40, pp. 1-21.

南陽市博物館

1974 〈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誌畫像石〉,《文物》, 8期, 頁73-75、41。

1985 〈南陽市王莊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 3期, 頁26-35。

Nanyang Museum

1974 “Nanyang faxian donghan xuaju muzhi huaxiangshi (The Carved Stone Epitaph in Xu A-Qu's Tomb Found in Nanyang),”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73-75, 41.

1985 “Nanyang shi wangzhuang han huaxiangshi mu (A Han Pictorial Stone Tomb Found at Wangzhuang in Nanyang City),”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3, pp. 26-35.

俞偉超

1980 〈漢代諸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頁332-337。

Yu, Wei-chao

1980 “Handai zhuwang yu liehou muzang de xingzhi fenxi—jianlun ‘zhouzhi,’ ‘hanzhi’ yu ‘jinzhi’ de san jieduanxing (Analysis of the Burial Systems for Kings and Feudal Lords in the Han Dynasty: Also on the Three-Phase Characteristics in Zhou, Han, and Jin Systems),” i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Zhongguo kaogu xuehui diyici nianhui lunwenji 1979* (Proceedings for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rchaeology in 1979),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332-337.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1989 〈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考古》, 4期, 頁313-318。

Luoyang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1989 “Luoyang caowei zhengshi banianmu fajue baog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Cao-Wei Tombs Built in 247 at Luoyang),” *Archaeology*, no. 4, pp. 313-318.

徐殿魁

1988 〈試述洛陽地區曹魏墓的分期問題〉,《中原文物》, 4期, 頁30-33、45。

Xu, Dian-kui

1988 “Shishu Luoyang diqu caoweimu de fenqi wenti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Cao-Wei Tombs in Luoyang),”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4, pp. 30-33, 45.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

1997 〈洛陽谷水晉墓(FM5)發掘簡報〉,《文物》, 9期, 頁41-48。

2000 〈洛陽春都路西晉墓發掘簡報〉,《文物》, 10期, 頁26-34。

The Second Luoyang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1997 “Luoyang gushui jinmu (FM5)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Jin Tomb [FM5] at Gushui in Luoyang),” *Cultural Relics*, no. 9, pp. 41-48.

2000 “Excavation of a Jin Dynasty Tomb in Luoyang,”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26-34.

南京博物院

1997 〈南京西善橋南朝墓〉，《東南文化》，1期，頁61-65。

Nanjing Museum

1997 “Nanjing xishanqiao nanchaomu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omb at Xishanqiao in Nanjing),” *Southeast Culture*, no. 1, pp. 61-65.

侯旭東

2015 《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增訂本）——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Hou, Xu-dong

2015 *Northern People's Buddhist Beliefs Seen through Donor's Inscriptio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updated vers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南秀雄

1993 〈高句麗壁畫の地軸像〉，《古文化談叢》，30集（中），頁945-952。

Minami, Hideo

1993 “Kōkuri hekiga no chijikuzō,” *Kobunka dansō: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Kyushu Prehistoric and Ancient Cultural Studies*, vol. 30, pp. 945-952.

徐潤慶

2011 〈從沙嶺壁畫墓看北魏平城時期的喪葬美術〉，收入巫鴻、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一輯》，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63-190。

Seo, Yun-kyung

2011 “A Painted Tomb at Shaling and Northern Wei Funerary Art of the Pingcheng Period,” in Hong Wu and Yan Zheng, eds., *Studies on Ancient Tomb Art*, vol. 1,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163-190.

孫危

2007 《鮮卑考古學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Sun, Wei

2007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Xianbei Culture*, Beijing: Science Press.

殷憲

2010 〈代郡衛氏書事活動及其意義〉，《文藝研究》，2期，頁133-136。

Yin, Xian

2010 “Daijun weishi shushi huodong ji qi yiyi (Calligraphic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Wei Family in Daiju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no. 2, pp. 133-136.

孫機

- 2012 〈仙凡幽明之間——漢畫像石與“大象其生”〉，收入氏著，《仰觀集：古文物的欣賞與鑑別》，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65-217。

Sun, Ji

- 2013 “Continued in Afterlife: A New Study of Han Dynasty Stone Carvings,” in Ji Sun, *Appreci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165-217.

韋正

- 2009 〈鮮卑墓葬研究〉，《考古學報》，3期，頁349-378。
2011 《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魏晉南北朝考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Wei, Cheng

- 2009 “A Study Of Xianbei Tombs,”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p. 349-378.
2011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Six Dynasties Tomb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Wei jin nanbeichao kaogu* (Archaeology of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倪潤安

- 2012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的年代及墓主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頁37-61。
2014 〈北魏平城時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轉型〉，《考古學報》1期，頁33-66。
2016 〈北朝墓主人圖像的顯與隱〉，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編，《兩個世界的徘徊：中古時期喪葬觀念風俗與禮儀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50-281。

Ni, Run-an

- 2012 “A Probe into the Date of the Tomb and Status of the Tomb Master of the Wei-Jin Period at Bajiao Village of Shijingshan District in Beijing,”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3, pp. 37-61.
2014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rials in the Pingcheng Region during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1, pp. 33-66.
2016 “Beichao mu zhuren tuxiang de xian yu yin (The Thematic and Unthematic Images of Northern Dynasties Tomb Occupants),” 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ed., *Liang ge shijie de paihuai: zhonggu shiqi sanzang guannian fengsu yu liyi zhidu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Proceedings for the Conference on Medieval Burial Ideas, Customs, and Ritual Systems),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250-281.

荒牧典俊

2000 〈北魏の忠臣高允の佛教思想〉，《東方學報》，72冊，頁159-179。

Aramaki, Noritoshi

2000 “Northern Wei Prime Minister Gao Yun on the Origin of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m,”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Kyoto*, vol. 72, pp. 159-179.

高橋佳典

2005 〈國忌法會を通じて見た唐代の佛教政策〉，收入福井文雅博士古稀 退職記念論集刊行會，《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アジア文化の思想と儀礼》，東京：春秋社，頁629-645。

Takahashi, Yoshinori

2005 “Kuniki hōkai o tsūjite mita tōdai no bukkō seisaku (Prayer Services on National Memorial Days as Viewed through the Buddhist Policy in the Tang Dynasty),”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ssays in Honour of Dr Fumimasa-Bunga Fukui on His Retirement and Seventieth Birthday, Philosophy and Ritual in Asian Culture: Essays in Honour of Dr Fumimasa-Bunga Fukui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Tokyo: Shunjusha Publishing Company, pp. 629-645.

倉本尚徳

2016 《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法藏館。

Kuramoto, Shoutoku

2016 *Studies of Inscriptions on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t Sculpture*, Kyoto: Hōzōkan.

游秋玫

2007 《漢代墓主畫像的圖像模式、功能與表現特色》，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Yu, Chiu-mei

2007 *Patterns, Functions and Expression Features of Images of Tomb Occupants in Han Dynasty*,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陳寅恪

1944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

Chen, Yin-ke

1944 *Sui tang zhidu yuanyuan luelun gao* (A Brief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Sui-Tang Political System), Chongq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宿白

1977 〈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文物》，5期，頁42-54。

1977 〈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二〉，《文物》，11期，頁38-46。

Su, Bai

1977 “Dongbei neimenggu diqu de xianbei yiji: xianbei yiji jilu zhiyi (Xianbei Remains in Manchuria and Inner Mongolia: Records of Xianbei Remains, Part 1),”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42-54.

1977 “Chengle, pingcheng yidai de tuoba xianbei beiwei yiji: xianbei yiji jilu zhier (Tuoba Xianbei Remain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Shengle and Pingcheng: Records of Xianbei Remains, Part 2),”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38-46.

陳大為、李宇峰

1982 〈遼寧朝陽後燕崔通墓的發現〉，《考古》，3期，頁270-274。

Chen, Da-wei, and Yu-feng Li

1982 “Liaoning Chaoyang houyan cuiyu mu de faxian (Cui Yu’s Tomb of the Later Yan Found at Chaoyang in Liaoning),” *Archaeology*, no. 3, pp. 270-274.

陳戌國

1995 《魏晉南北朝禮制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Chen, Shu-guo

1995 *Wei jin nanbeichao lizhi yanjiu* (Research on the Ritual Systems of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康樂

1995 《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鄉出版社。

Kang, Le

1995 *Cong xijiao dao nanjiao: guojia jidian yu beiwei zhengzhi* (From the Western Suburb to the Southern Suburb: State Cults and Northern Wei Politics), Taipei: Daw Shiang Publishing.

國家文物局主編

2006 《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ed.

2006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2005*,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船木勝馬

1989 《古代遊牧騎馬民の國—草原から中原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

Funaki, Katsuma

1989 *Kodai yuuboku kibamin no kuni: Sougen kara chuugen e* (An Ancient State of Nomadic and Equestrian People: From Steppes to the Central Plain), Tokyo: Seibundo shinkosha.

黃曉芬

1994 〈漢墓的變容—槨から室へ—〉，《史林》，77卷5號，頁1-39。

2000 《中國古代葬制的傳統と變革》，東京：勉誠出版。

2003 《漢墓的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

Huang, Xiao-fen

- 1994 “Kan haka no hen'yō: kaku kara muro e (Transformation of Han Tombs: From Nested Coffins to Chambers),” *Journal of History*, 77: 5, pp. 1-39.
- 2000 *Chūgoku kodai kousei no dentou to henkaku*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urial System), Tokyo: Bensei Publishing.
- 2003 *Hanmu de kaoguxue yanjiu*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Han Tombs),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 1963 〈雲南省昭通後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2期，頁1-5。

Yunnan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 1963 “Yunnan sheng zhaotong houhaizi dongjin bihuamu qingli jianbao (Brief Report on an Eastern Jin Mural Tomb at Houhaizi, Zhaotong, Yunnan),”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1-5.

張金龍

- 1996 《北魏政治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Zhang, Jin-long

- 1996 *Beiwei zhengzhishi yanjiu*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Lanzhou: Gan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喬梁

- 1999 〈鮮卑遺址的認定與研究〉，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下，香港：商務印書館，頁483-508。

Qiao, Liang

- 1999 “Xianbei yizhi de rending yu yanjiu (Identification and Research of Xianbei Sites),” in Zhuo-yun Xu and Zhong-pei Zhang, eds., *Zhongguo kaoguxue de kuashiji fansi* (Reflection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art Two,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 483-508.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朝鮮畫報社編

- 1986 《德興里高句麗壁畫古墳》，東京：講談社。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Korea Pictorial, eds.

- 1986 *Tokuko Kōkuri hekiga kofun* (Ancient Goguryeo Mural Tombs at Deokheung-ri), Tokyo: Kodansha.

曾布川寬

- 1986 〈秦始皇陵と兵馬俑に関する試論〉，《東方學報》，58冊，頁355-461。
- 1993 〈漢代畫像石における昇仙圖の系譜〉，《東方學報》，65冊，頁23-221。
- 2006 《中國美術の圖像と様式》研究篇，東京：中央公論社。
- 2006 〈中國出土のソグド石刻畫像試論〉，收入氏編，《中國美術の圖像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97-182。

2008 〈雲岡石窟再考〉,《東方學報》, 83冊, 頁1-155。

Sofukawa, Hiroshi

1986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Imperial Tomb of Qin Shihuang and the Terracotta Figures of Soldiers and Horses,”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Kyoto*, vol. 58, pp. 355-461.

1993 “Scenes of Shengxian 昇仙, Ascendancy to the World of Legendary Wizards, Depicted on Chinese Han Stone Reliefs: Their Lineag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Kyoto*, vol. 65, pp. 23-221.

2006 *Chūgoku bijutsu no zuzou to yōshiki* (Images and Styles in Chinese Art), kenkyu hen (Research Articles), Tokyo: Chuokoron-shinsha.

2006 “Chūgoku shutsudo no sogudo sekkoku gazō shiron (Discussion on the Sogdian Stone Carvings Unearthed in China),” in Hiroshi Sofukawa, *Chūgoku bijutsu no zuzōgaku*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in Chinese Art),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pp. 97-182.

2008 “The Yungang Stone Grottoe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Kyoto*, vol. 83, pp. 1-155.

曾布川寬、吉田豐編

2011 《ソグドの美術と言語》, 京都: 臨川書店。

Sofukawa, Hiroshi, and Yutaka Yoshida, eds.

2011 *Sogudo no bijutsu to gengo* (Sogdian Art and Language), Kyoto: Rinsen Book Company.

森野繁夫、佐藤利行編著

1988 《淳化閣帖 法帖篇》, 東京: 白帝社。

Morino, Shigeo, and Toshiyuki Sato, eds.

1988 *Junkakakujō hōjō-hen* (Model Letters from the Chunhua Pavilion, the Model Calligraphy Volume), Tokyo: Hakuteisha.

楊泓

1986 〈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 收於《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頁268-276。

1992 〈魏晉北朝墓葬〉, 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頁543-544。

1999 〈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文物》, 10期, 頁60-68。

2000 《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0 〈考古學所見三國文化〉, 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千古英雄—大三國特展》, 臺北: 國立歷史博物館, 頁12-21。

Yang, Hong

1986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Pottery Figurin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ed.,

-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A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ieth Year of Prof. Xia Nai's Work in Archaeolog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68-276.
- 1992 “Wei jin beichao muzang (Tombs and Burials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Volum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pp. 543-544.
- 1999 “Evolution of the Funerary Practice of the Time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60-68.
- 2000 *Art Archaeology and Buddhist Art of the Han-Tang Period*, Beijing: Science Press.
- 2010 “Archeological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ra,” in Editorial Board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ed., *Legends of Heroes: the Heritag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ra*, Taipei: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pp. 12-21.
- 塚本善隆
- 1944 《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東京：弘文堂。
- Tsukamoto, Zenryu
- 1944 *Shina bukkyoushi kenkyuu: Hokugi hen* (Research o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Northern Wei Volume), Tokyo: Koubundou.
- 楊愛國
- 2006 《幽明兩界：紀年漢代畫像石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 Yang, Ai-guo
- 2006 *Youming liangjie: jinian handai huaxiangshi yanjiu* (Life and Afterlife: Studies on Han Carving Stones with Date Inscriptions),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趙吳成
- 2005 〈河西墓室壁畫中「伏羲、女媧」和「牛首人身」、「雞首人身」圖像淺析〉，《考古與文物》，4期，頁66-70。
- Zhao, Wu-cheng
- 2005 “The Primary Analyses of the Murals Portraits ‘Fuxi & Nuwa’ and the Portraits with Ox’s Head and Chicken’s Head in the Hexi Corridor Area,”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66-70.
- 蒲慕州
- 1993 《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Poo, Mu-chou
- 1993 *Muzang yu shengsi—Zhongguo gudai zongjiao zhi shengsi* (Burial and the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Pondering on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劉昭瑞
- 2002 〈記幾件漢魏神座石刻〉，《考古與文物》增刊，頁222-226、239。

2007 《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Liu, Zhao-rui

2002 “Ji jijian hanwei shenzuo shike (Notes on Several Stone-Carved Idol Bases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 Supplement, pp. 222-226, 239.

2007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Early Daoist Religio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趙瑞民、劉俊喜

2006 〈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出土漆皮文字考〉，《文物》，10期，頁78-81。

Zhao, Rui-min; Liu, Jun-xi

2006 “A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Record on Lacquer Piece of the Record on Lacquer Piece of the Mural Tomb Located in Shaling, Dat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78-81.

黎瑤渤

1973 〈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3期，頁2-32。

Li, Yao-bo

1973 “Liaoning beipiaoxian xiguanyingzi beiyan fengsufu mu (The Northern Yan Tomb of Feng Sufu Couple at Xiguanyingzi, Beipiao County, Liaoning),”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2-32.

蔣贊初

1980 〈關於長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96-205。

2001 《長江中下游歷史考古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Jiang, Zan-chu

1980 “Guanyu zhangjiang xiayou liuchao muzang de fenqi he duandai wenti (Periodization of Six Dynasties Tomb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Zhongguo kaogu xuehui dierci nianhui lunwenji* (Proceedings for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rchaeolog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196-205.

2001 *Treatises on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the Middle & Lower Regions of Yangtze River*, Beijing: Science Press.

劉玉新

1999 〈山東省東阿縣曹植墓的發掘〉，《華夏考古》，1期，頁7-17。

Liu, Yu-xin

1999 “Shandong sheng donga xian caozhi mu de fajue (Excavation of Cao Zhi’s Tomb at Dong’e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Huaxia Archaeology*, no. 1, pp. 7-17.

劉濤

2001 〈魏晉南北朝的禁碑與立碑〉，《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頁4-11。

Liu, Tao

2001 “Weijin nanchao de jinbei yu libei (Ban and Setting Up of Steles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3, pp. 4-11.

潘其風

2001 〈北京石景山區八角村魏晉壁畫墓出土人骨的觀察研究〉，《文物》，4期，頁92-95。

Pan, Qi-feng

2001 “Beijing shijingshanqu bajiaocun weijin bihuamu chutu rengu de guancha yanjiu (Observations of the Human Bones Excavated from the Wei-Jin Mural Tomb at Bajiao Village,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92-95.

鄭岩

2000 〈墓主畫像研究〉，山東大學考古學系編，《劉敦愿先生紀念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頁450-468。

2002 《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3 《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Zheng, Yan

2000 “On the Portraits of Tomb Occupants,” The Archaeology Department of Shandong University, ed.,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u Dunyuan*,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pp. 450-468.

2002 *Wei jin nanbeichao bihuamu yanjiu* (A Study of Tombs with Murals during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3 *Masking Death: Funerary Art of Medieval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齊東方

2015 〈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考古學報》，3期，頁345-366。

Qi, Dong-fang

2015 “The Study on the “Jin System” of the Funeral Systems in Ancient China,”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p. 345-366.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朝陽地區博物館文物隊、朝陽縣文化館

1984 〈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文物》，6期，頁29-45。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of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Cultural Relics Working Team of Chaoyang Area Museum, and Chaoyang County Cultural Museum

1984 “Chaoyang yuantaizi dongjin bihuamu (The Eastern Jin Yuantaizi Tomb with Murals at Chaoyang),”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29-45.

遼寧省博物館編著

2015 《北燕馮素弗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ed.

2015 *Feng Sufu Couple's Tombs of the Northern Y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盧嘉錫總主編；丘光明等著

2001 《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Lu, Jia-xi, ed.; Qiu, Guang-ming, et al.

2001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vol. 24, Weights and Measures, Beijing: Science Press.

魏堅 編

1998 《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4 《內蒙古地區鮮卑墓葬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Wei, Jian, ed.

1998 *South Central Inner Mongolia, the Han Dynasty Tombs*,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4 *Neimenggu diqu xianbei muzang de faxian yu yanjiu*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Xianbei Tombs in Inner Mongolia), Beijing: Science Press.

韓國河

1999 《秦漢魏晉喪葬制度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Han, Guo-he

1999 *Qin han wei jin sangzang zhidu yanjiu* (Burial Systems of the Qin,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謝明良

1998 〈從階級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期，頁1-40。

2006 《六朝陶瓷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sieh, Ming-liang

1998 "The Six Dynasties Burial Objects as a Reflection Social Status,"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5, pp. 1-40.

2006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Six Dynasties Ceramic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鎮江市博物館

1973 〈鎮江東晉畫像磚墓〉，《文物》，4期，頁51-58。

Zhenjiang Museum

1973 "Zhenjiang dongjin huaxiangzhuan mu (The Eastern Jin Tomb with Mural Bricks in Zhenjiang),"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51-58.

魏鳴

1986 〈魏晉薄葬考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學社會科學）》，4期，頁133-143。

Wei, Ming

1986 "Wei jin bozang kaolun (Inquiry into the Austere Burials of the Wei-Jin Period),"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 pp. 133-143.

顏娟英主編

2005 《美術與考古》上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8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Yen, Chuan-ying, ed.

2005 *Meishu yu kaogu*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1,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2008 *Selections of Buddhist Stone Rubbing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嚴耀中
1990 《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Yan, Yao-zhong
1990 *Beiwei qianqi zhengzhi zhidu*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Changchun: Jilin Education Press.
- 羅宗真
1996 《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Luo, Zong-zhen
1996 *Liuchao kaogu* (Archaeology of the Six Dynastie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羅宗真、王志高
2004 《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出版社。
- Luo, Zong-zhen, and Zhi-gao Wang
2004 *Liuchao kaogu* (Archaeology of the Six Dynasties), Nanjing: Nanjing Press.
- 羅伯特·沙夫著；夏志前、夏少偉譯
2009 《走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Sharf, Robert H.; Xia, Zhi-chien, and Shao-wei Xia, trans.
2009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 饒宗頤主編；劉昭瑞著
2001 《漢魏石刻文字繫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Jao, Tsung-I, ed.; Liu, Zhao-rui
2001 *Han Wei shike wenzi jinian* (Chronology of Han and Wei Stone Inscriptions), Taipei: Xin Wen Feng Print.
- Abe, Stanley K.
1990 "Art and Practice in A Fif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Cave Temple," *Ars Orientalis*, no. 20, pp. 1-31.
2002 *Ordinary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en, Albert E.
2007 *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 Wei-kam
1961 "Hun-p'ing: The Urn of the Soul,"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vol. 48, no. 2, pp. 26-34.
- Knapp, Keith N.
2000 "Heaven and Death According to Huangfu Mi, A Third-century Confucian," *Early Medieval China*, no. 1, pp. 1-31.

Lai, Guo-long

2015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ese Relig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oo, Mu-chou

1998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eckel, Dietrich

1993 "The Rise of Portraiture in Chinese Art," *Artibus Asiae*, vol. 53, no. 1/2, pp. 7-26.

Sharf, Robert H.

2001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teinhardt, Nancy S.

2001 "From Koguryōto Gansu and Xinjiang: Funerary and Worship Space in North Asia 4th-7th Centuries," in Hung Wu, ed., *Between Han and Tang: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teraction in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pp. 153-203.

Ware, James R.

1936 "An Ordeal Among the T'o-pa Wei," *To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2, Livr. 4, pp. 205-209.

Wu, Hung

2002 "A Deity Without Form: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on of Laozi and the Concept of Wei in Chinese Ritual Art," *Oriental Art*, vol. 34, no. 4, pp. 38-45.

Yu, Ying-shih

1987 "'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m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no. 47, pp. 363-395.

圖版出處

- 圖1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頁315。
- 圖2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頁317。
- 圖3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春都路西晉墓發掘簡報〉，頁26。
- 圖4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頁9。
- 圖5 陳大為、李宇峰，〈遼寧朝陽後燕崔適墓的發現〉，頁271。
- 圖6 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北燕馮素弗墓》，頁9。
- 圖7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37。
- 圖8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圖版15。
- 圖9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省昭通後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頁2。
- 圖10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省昭通後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圖版1。
- 圖11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省昭通後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圖版3。
- 圖12 鎮江市博物館，〈鎮江東晉畫像磚墓〉，頁52、56。
- 圖13 姚遷、古兵編著，《六朝藝術》，頁160。
- 圖14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頁29。
- 圖15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頁39。
- 圖16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圖版5-2。
- 圖17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圖版6-2。
- 圖18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頁16。
- 圖19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頁17。
- 圖20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頁30。
- 圖21 李慶發，〈遼陽上王家村晉代壁畫墓清理簡報〉，頁60。
- 圖22 李慶發，〈遼陽上王家村晉代壁畫墓清理簡報〉，頁61。
- 圖2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33。
- 圖24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34。
- 圖25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13。
- 圖26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頁17。
- 圖27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墓—西晉畫像磚墓》，圖版5。
- 圖28 石景山區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區八角村魏晉墓〉，頁55。
- 圖29 石景山區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區八角村魏晉墓〉，頁55。
- 圖30 魏堅編，《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頁259。
- 圖31 魏堅編，《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圖版15-4。
- 圖32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千古英雄—大三國特展》，頁128、129。
- 圖33 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1。
- 圖34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六冊，Plan IV。

- 圖3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頁7。
- 圖3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頁19。
- 圖3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北魏墓（M7、M9）發掘簡報〉，頁9。
- 圖3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北魏墓（M7、M9）發掘簡報〉，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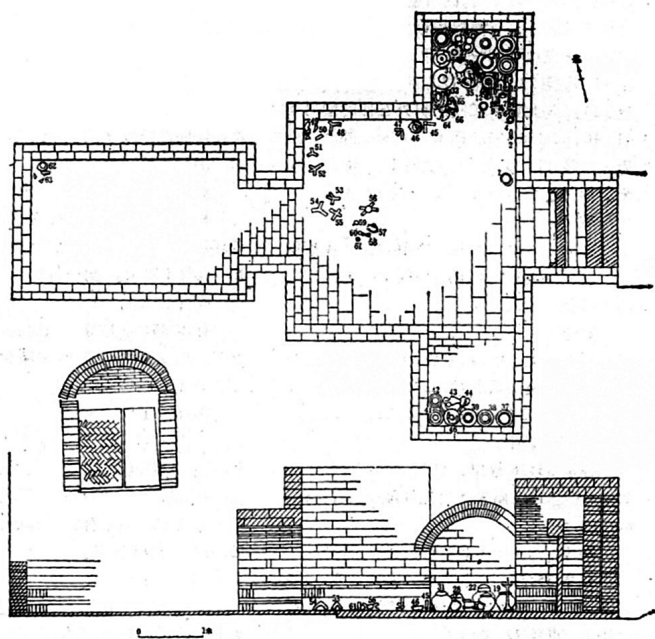


圖1 曹魏正始八年（247）洛陽澗西16工區M2035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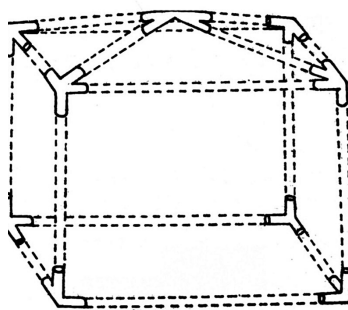


圖2 鐵帷帳架復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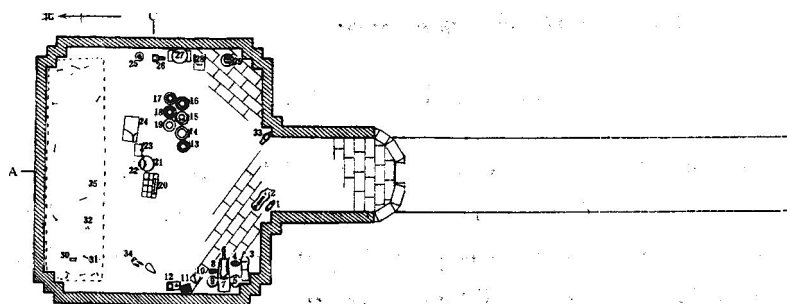


圖3 西晉 洛陽春都路編號IM1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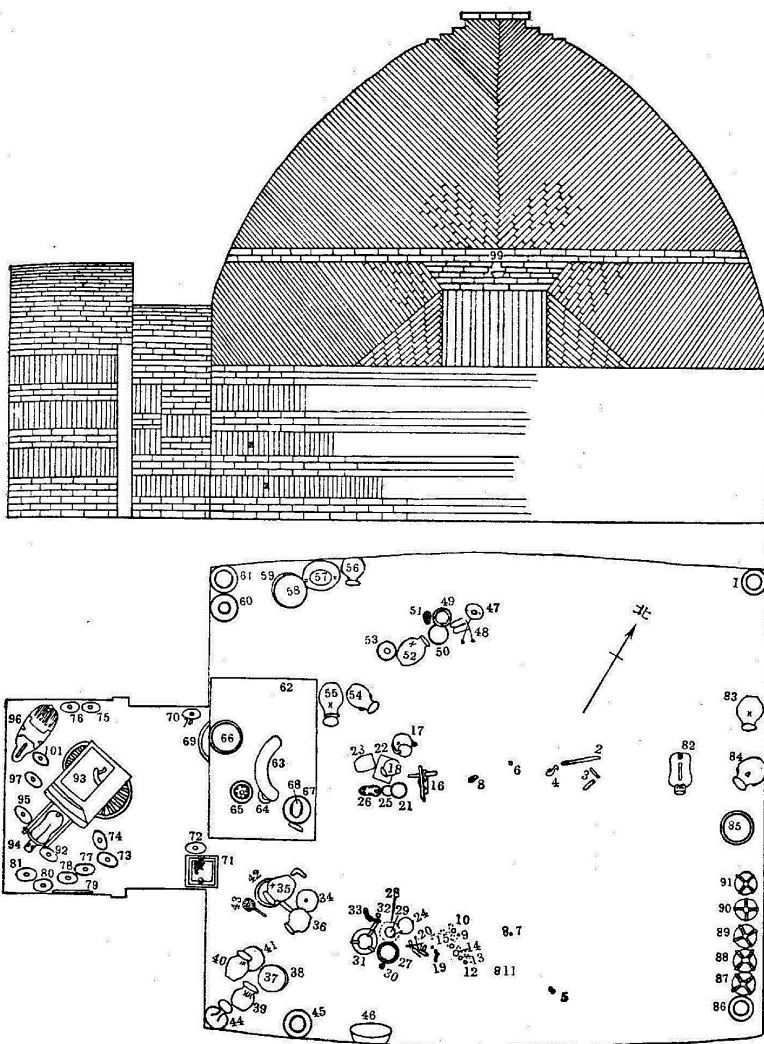


圖4 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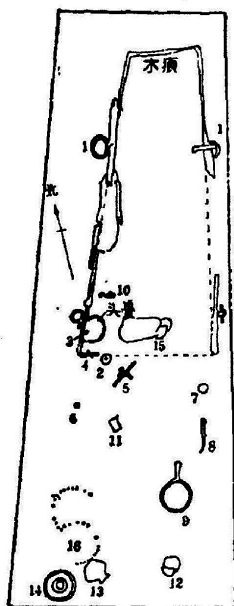


圖5 遼寧朝陽後燕建興十年（395）昌黎太守崔適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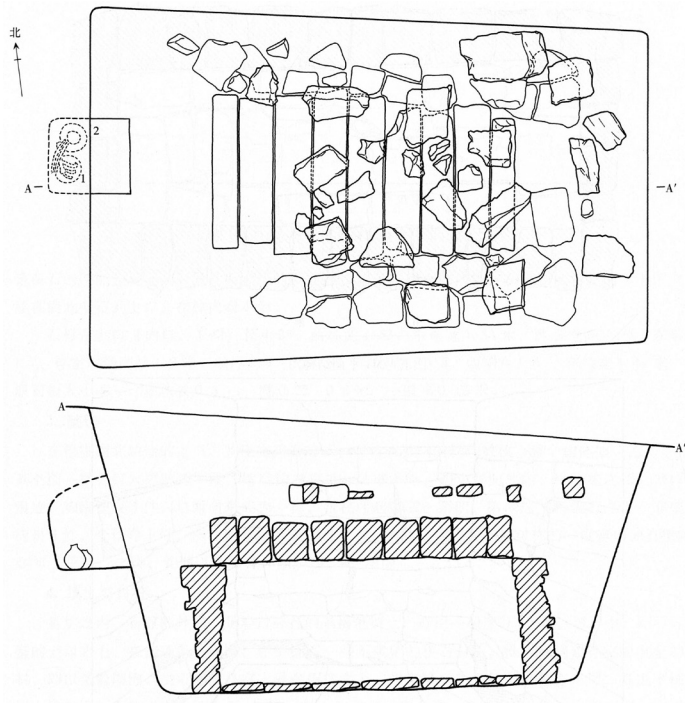


圖6 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太平七年（415）馮素弗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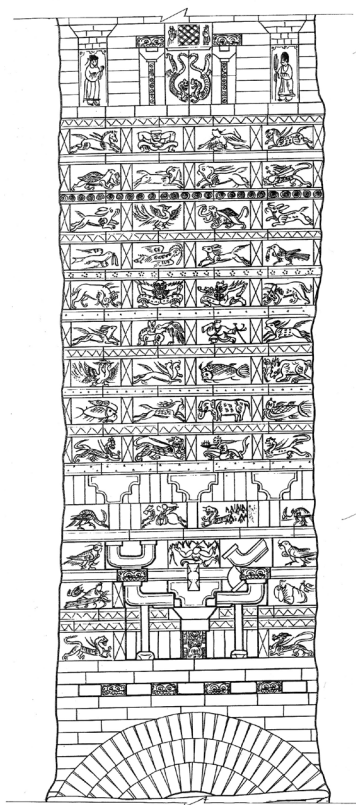


圖7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基M133 照牆 線描圖



圖8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基M133 照牆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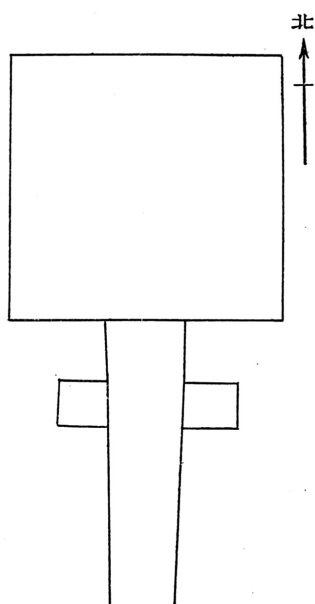


圖9 雲南省昭通縣霍承嗣壁畫墓 平面圖



圖10 雲南省昭通縣霍承嗣壁畫墓 北壁線描圖



圖11 雲南省昭通縣霍承嗣壁畫墓 西壁線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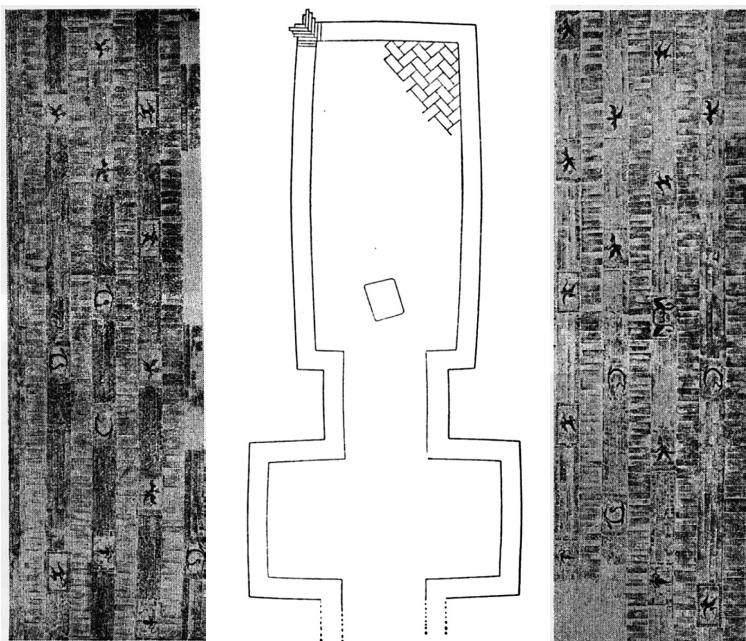


圖12 江蘇鎮江東晉隆安二年(398)畫像磚墓 平面圖與後室畫像磚分布



圖13 江蘇鎮江東晉隆安二年（398）畫像磚墓 獸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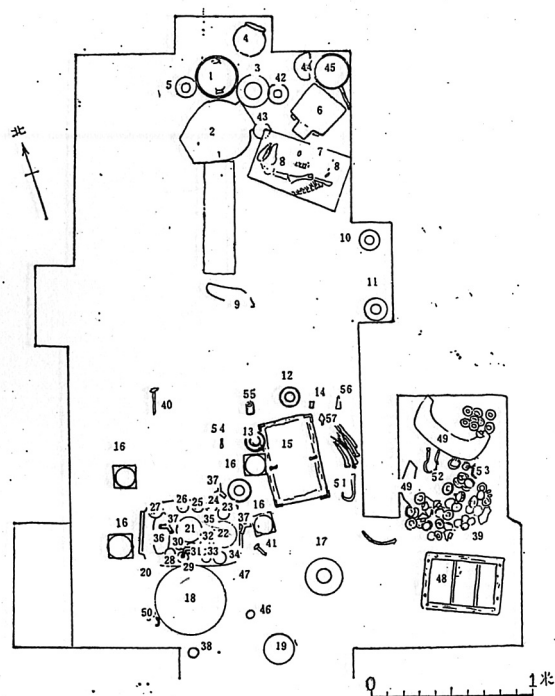


圖14 遼寧朝陽袁臺子壁畫墓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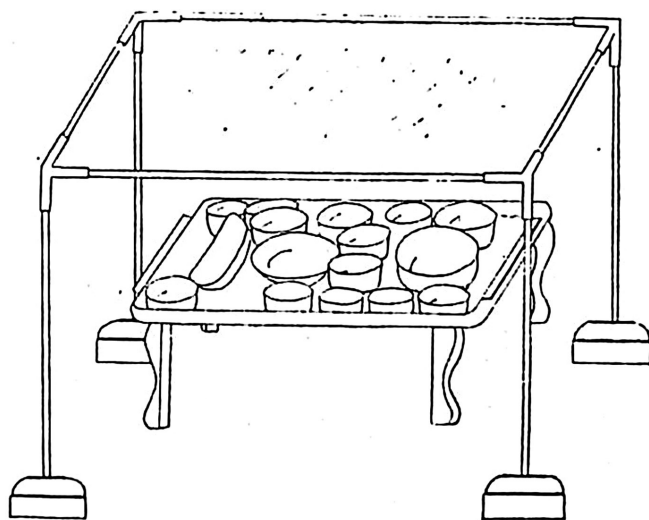


圖15 遼寧朝陽袁臺子壁畫墓 鎏金銅帳座與漆案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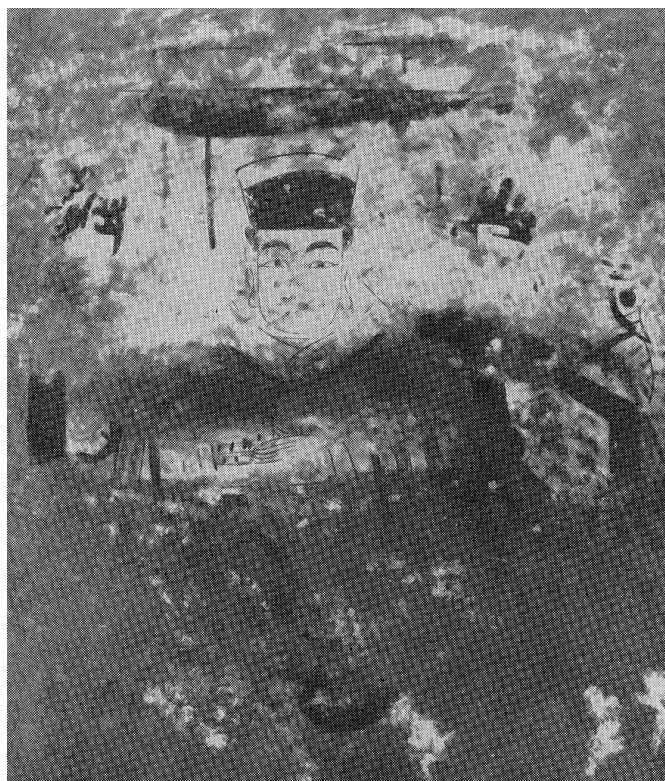


圖16 遼寧朝陽袁臺子壁畫墓 墓主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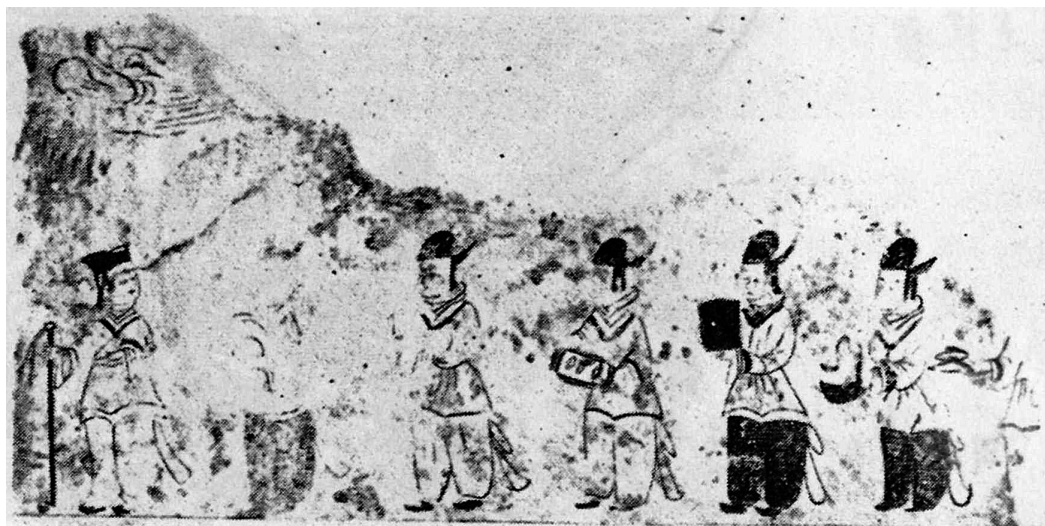


圖17 遼寧朝陽袁臺子壁畫墓 奉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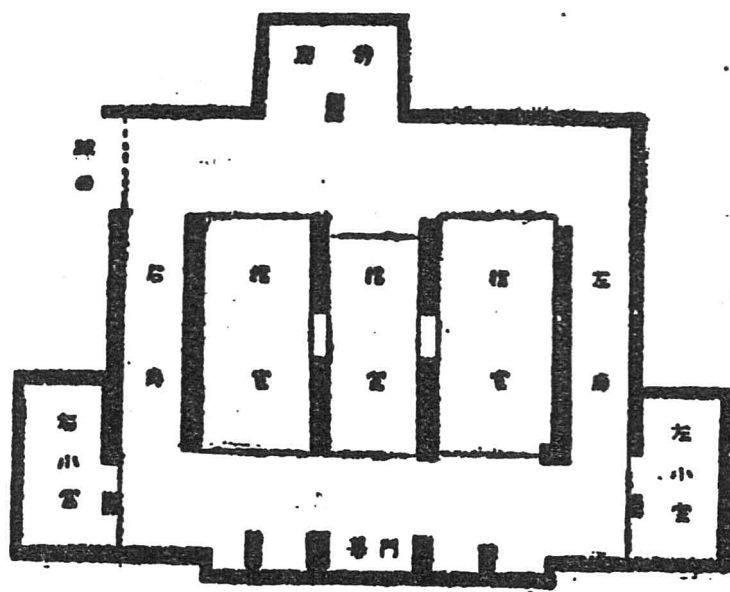


圖18 遼寧遼陽棒臺子屯壁畫墓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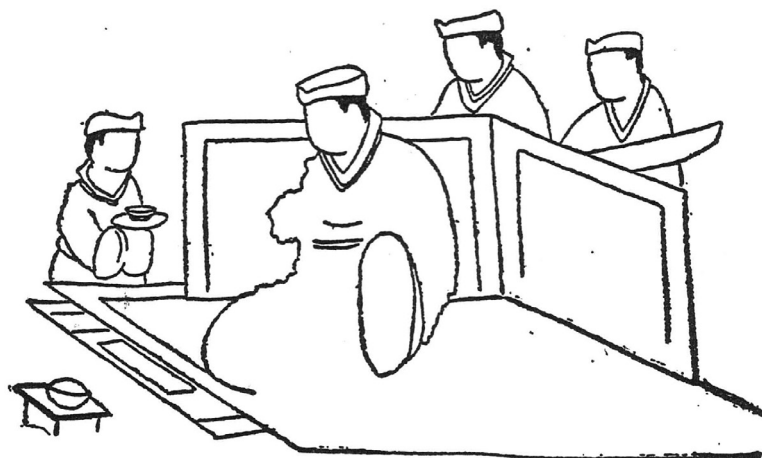


圖19 遼寧遼陽棒臺子屯壁畫墓 墓主宴飲圖



圖20 遼陽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壁畫墓 墓主夫婦宴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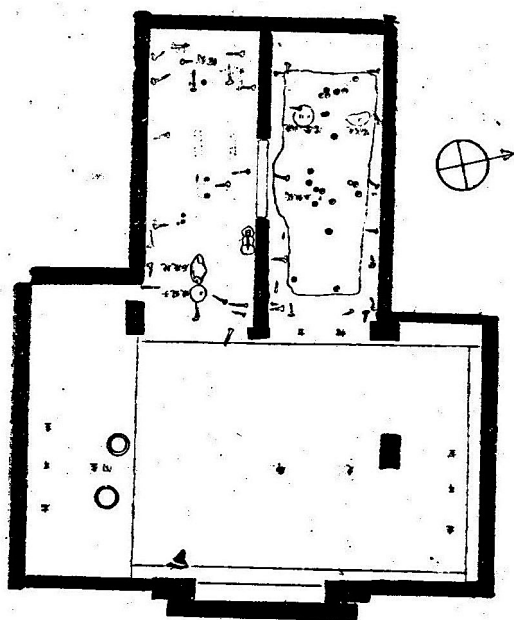


圖21 遼陽上王家村壁畫墓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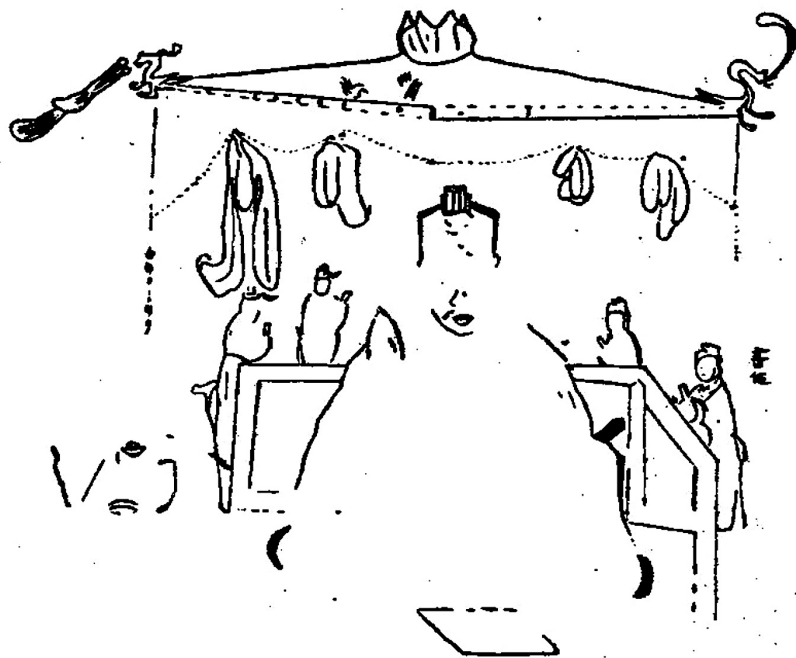


圖22 遼陽上王家村壁畫墓 墓主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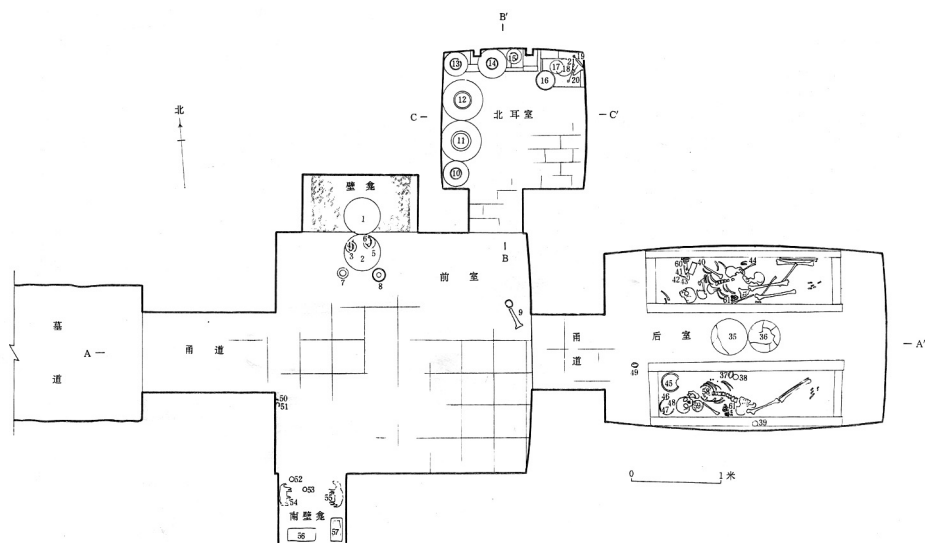


圖23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M133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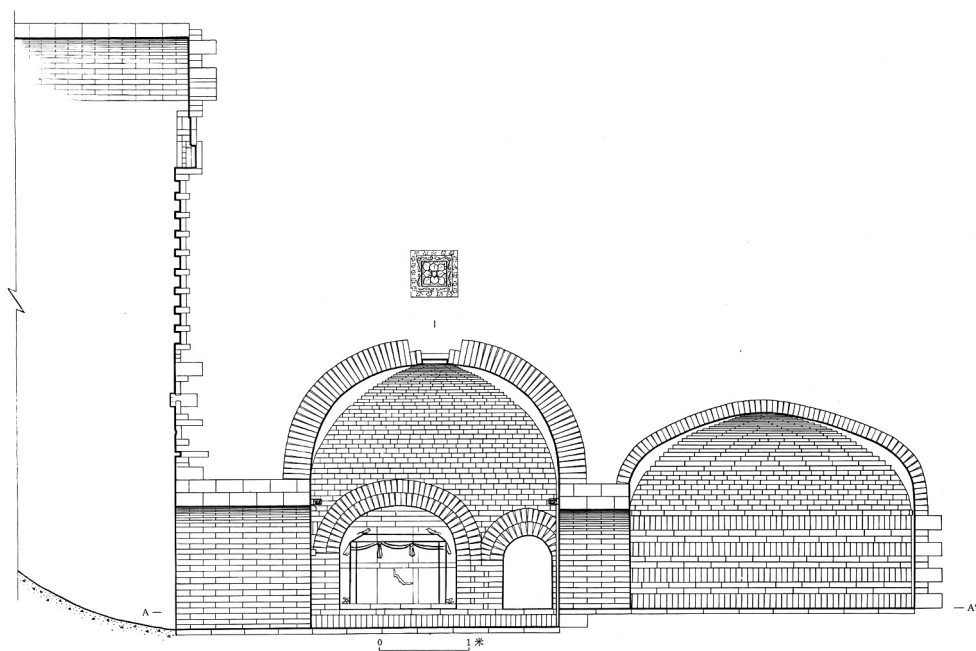


圖24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M133 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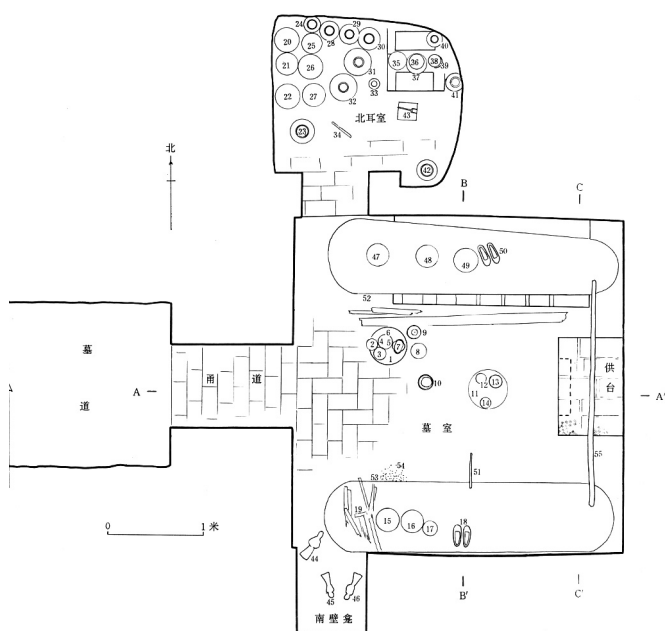


圖25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M37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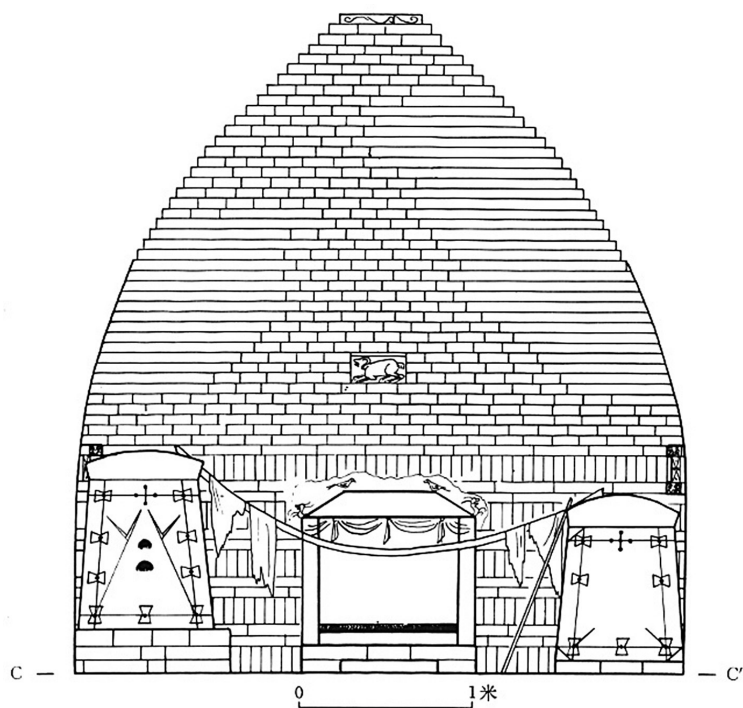


圖26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M37 東壁 線描圖



圖27 敦煌佛爺廟灣壁畫墓M37 東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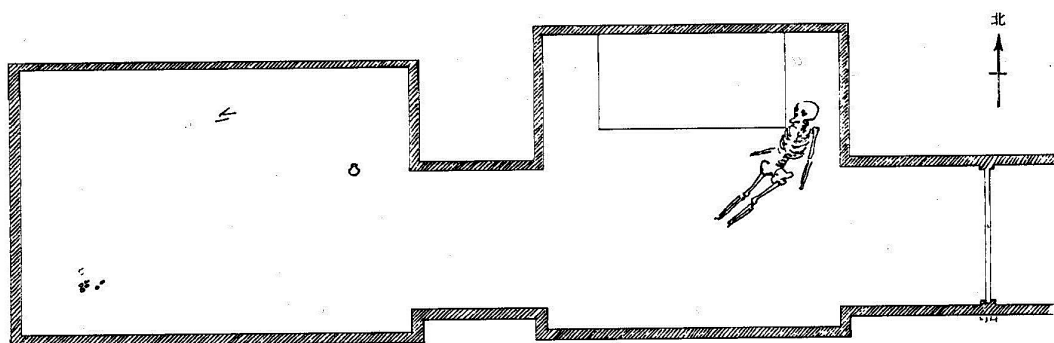


圖28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 平面圖



圖29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 石龕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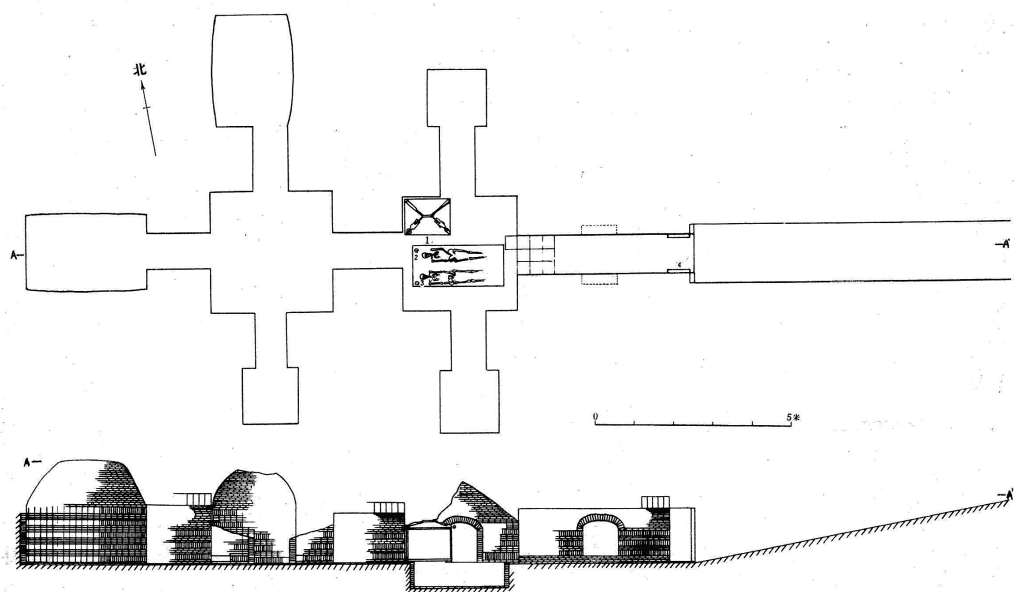


圖30 蒙古包頭市南郊召灣東漢建寧三年(170) M91墓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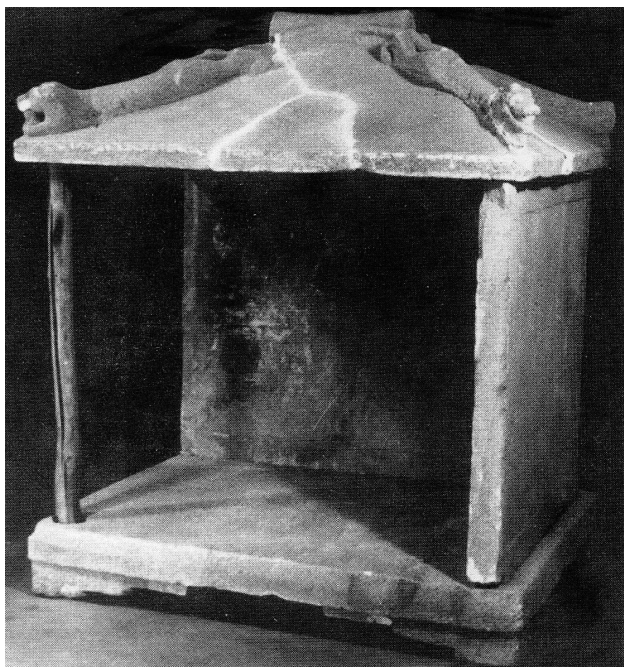


圖31 蒙古包頭市南郊召灣M91建寧三年（170）東漢墓 石屋



圖32a 曹魏 鮑捐神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2b 鮑捐神坐 拓片



圖33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宕昌公暉福寺碑》拓片 傅斯年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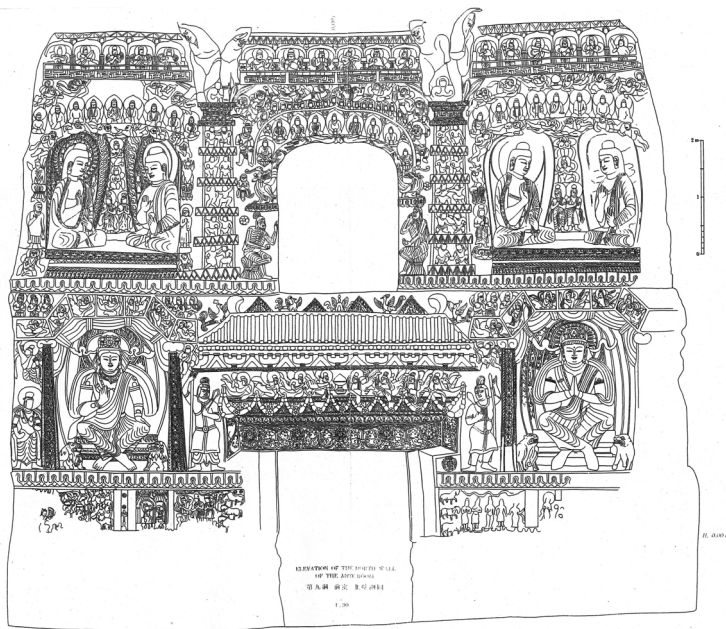


圖34 雲岡石窟第九窟 前室北壁實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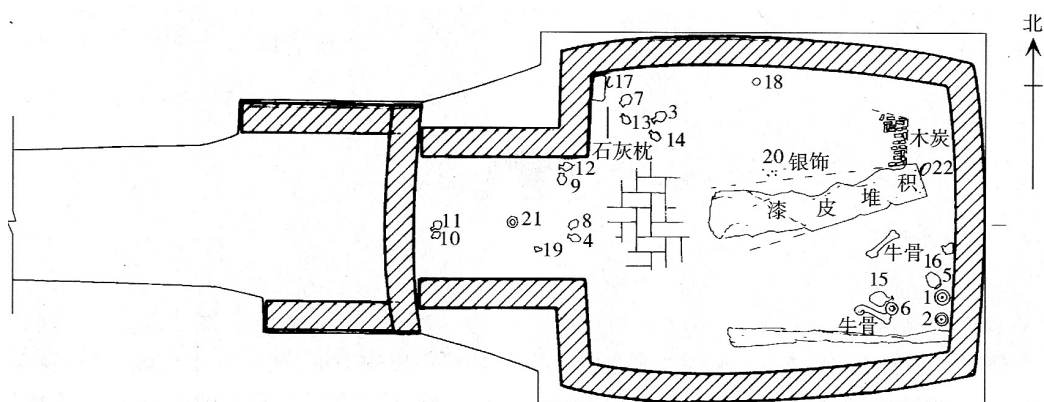


圖35 北魏太延元年(435)山西大同沙嶺壁畫墓 平面圖



圖36 北魏太延元年(435)山西大同沙嶺壁畫墓 東壁中央 墓主夫婦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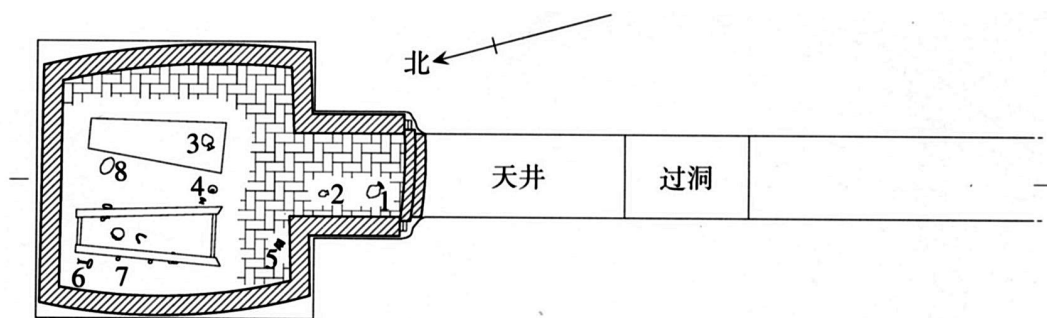


圖37 北魏和平二年（461）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M9壁畫墓 平面圖



圖38 北魏和平二年（461）山西大同南郊全家灣M9壁畫墓 北壁 線描圖

Transformation of Mortuary Cultures from the Wei-Jin Period to the Northern Wei Pingcheng Period: A Perspective Based on Images

Lin, Sheng-chi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tries to re-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rtuary cultures from the Wei-Jin period to the Northern Wei Pingcheng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e of images. The prevailing practices of austere burials in the Wei-Jin dynasties make the offerings, spirit seats, and spirit beds become important installations in the tombs. Those practices reveal a new idea about the afterlife that the spirits of the deceased only reside in the tombs temporarily rather than permanently. Those practices had also influenced the layout of the murals in the tombs, and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can be confirmed between the murals and the offerings. The altar, tent, and the frontal image of the tomb occupants together form a complete ritual unit.

In the Northern Wei Pingcheng period, members of the Dai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tended to adopt the practice of lavish burials again, building shrines, erecting tomb tablets, as well as using images systematically. The belief of the tombs being the dwelling for the afterlife had once again been stressed, while some elements of the austere burials had also been preserved. In this paper, the new hybrid mortuary culture of the Pingcheng period is referred to as “the lavish burial style of Pingcheng.” In order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y of mortuary imag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attitude toward images would be beneficial. By considering the Xianbei’s indigenous customs, Buddhist belief, and Han-Jin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 author tries to delive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how these mortuary images were perceived and manipulated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Dai group.

Keywords: Wei-Jin period, Northern Wei dynasty, austere burials, lavish burials, offerings in tombs, images